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Thursday, 25 November 2010

下午2時30分會議繼續
**The Council continued to me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劉江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以主席身份在2010年11月25日主持會議)

(Presiding as President on 25 November 2010)

劉慧卿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 ATTENDING: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第二項議案：紓緩貧富懸殊。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馮檢基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紓緩貧富懸殊

ALLEVIAT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代理主席，近來社會出現一種頗為強烈的仇富和反商情緒，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分歧似乎越來越明顯。或許各界人士對這股情緒的發生和蔓延會有不同的解讀，但我相信“冰封三尺，絕非一日之寒”，階級矛盾的積聚，源於貧富差距的擴大，源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我們必須認真反思，香港一直以來奉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出現了問題？政府既有的施政理念，又是否不濟呢？再加上一個封閉、滯後的政治制度，總體構成一個非驢非馬、漏洞處處的政經混合體，失去了自我更新和進步的能力，這也許才是我們應該認真看待和解決結構性的矛盾。

代理主席，事實上，社會今天所積累的怨憤和矛盾，與政府過去一直持守的所謂“大市場，小政府”施政理念是有莫大關係的。由此理念而引申出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過去均出現嚴重偏頗，很多原本應該以政府行為來改善和調節的民生大事，絕大部分也傾向交予市場解決，由交通、居屋，以至基層就業、市民生活等的各個層面，皆任由市場一手包辦，甚至為所欲為，政府根本沒有盡半點應有的責任。

市場遊戲規則除了汰弱留強外，對基層也可以說是趕盡殺絕，根本沒有半點關愛和體諒可言。此外，在重商主義的作祟下，政府放任

不管，商界因而被縱得驕生慣養，舊有的營商思維，追求最大的利潤、有錢“賺到盡”的手法，依然大行其道。企業有企業挖空心思來賺取市民的一分一毫；金融機構則巧立名目，一心要謀取市民畢生的積蓄，而有大財團更是巧取豪奪，跨行業的壟斷。在市場橫行霸道的情況下，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形同虛設，有時更可能成為商家短視和貪婪本質的塗脂抹粉。

代理主席，在政商聯手的大背景下，你說階級間的怨氣和矛盾怎會不累積呢？貧富差距怎不會越擴越大呢？如果我們再不扭轉這個局面，改變經濟結構嚴重的失衡、緩和社會階級間鮮明的分野，我們社會將難以和諧穩定，社會的長遠發展亦會黯淡無光。

代理主席，我要提出政商聯手的例子，暫時我不想詳細談論拒絕復建居屋的做法，因為以往亦有很多次的討論。拱手把中、下階層的住屋需要交由市場解決，結果造成今天市民蝸居和住屋難的困境。因為近來社會就住屋問題已說了很多意見，我不再重複了。

以就業和勞工市場為例，隨着過去香港的經濟轉型，客觀上，本地工業正走向式微。相反，金融和服務等行業卻在當局選擇性的政策傾斜下，得以急速發展。過去曾提供大量基層職位的傳統製造業，因工廠追逐低廉成本而向北遷移，加上當局由始至終也缺乏遠見和視野，無為而治加上“自由市場”作擋箭牌，政府堅拒投放資源，推動工業增值和創新轉型，不理會製造業的沒落和對基層帶來的負面影響。

由於本地工業無從發展，最終導致大量基層職位流失，金融等服務行業則“單天保至尊”，形成今天勞工市場兩極化的趨勢，整個就業市場呈發展失衡的狀態，這正是既有施政理念所種下的基層持續貧窮禍根。基層原本可以脫貧往上流動的階梯，越來越收窄。基層既失去發展機會，自然與處於優勢一端的高技術勞工形態成為強烈對比。

高技術勞工不論在工資、際遇、發展機會和生活條件也不斷改善和提升，甚至連失業率也不到2%，幾乎等同全民就業。相反，低技術勞工的失業率則長期高於整體失業率，工資和生活條件也遠遠落後，甚至變得越來越差。低收入家庭工資，在經濟高速增長下是相反地每況愈下。在自由市場中，被迫接受低賤工作，工資被無良僱主嚴重壓低，連糊口也成問題，加上日以繼夜的工作，家庭生活空白一片，

可謂全無尊嚴可言，更遑論有丁點兒往上流的機會。在社會這種困局下，你說貧富差距怎能收窄，怎能不越拉越闊呢？

代理主席，剛才好像說了很多說話指責商界不對，是說商界的壞話，但我亦必須強調，香港人從來不反商，更遑論會有任何仇恨的成分。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是反商的(除了開始共產主義的社會)，社會肯定要依靠商界來提供就業機會、提高效率、創造財富和提供稅收等，但商界必須取之有道，接受社會合理的規範，不可以再如往常般唯利是圖、予取予求、直接製造社會不公平。我相信，企業在追逐利潤及履行社會責任間，必須取得平衡。否則，在一個失效的所謂自由市場或我所稱的“壞市場”，剝削壓迫處處的環境，社會是無法持續發展的。

代理主席，現時的經濟環境乍暖還寒，隨着美國推出第二期量化寬鬆政策，西方與新興市場之間的經濟角力越見劇烈，放手或收緊，調控或寬鬆。香港處於這夾縫下，進退維谷，經濟前景十分不明。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正是要提醒社會，在這個波濤洶湧、經濟狀況異常扭曲的時期，當傳媒把所有的焦點放在經濟和樓價的時候，社會是不可以忽略貧窮問題。短期經濟波動固然要應付，但困擾社會持久的貧富懸殊問題，是同樣需要我們的高度關注的。

代理主席，一言以蔽之，正如我剛才所言，貧富懸殊惡化是源於政府政策嚴重傾斜、重商主義的霸道、自由市場壓倒一切、當局完全漠視基層落後於經濟急劇轉變的狀況。可是，政府在今時今日仍停留在以往的滴漏理論，認為經濟持續發展，財富便自自然然會滲透在基層市民身上，但這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說法，只要查考一些統計數字，大家便會一清二楚了。

如果把全港住戶按每月家庭收入分為十等，最低組別的每月收入中位數是由1996年的2,952元，跌至2001年的2,888元，再跌至2006年的2,400元。而從1996年至2006年，香港的生產總值(GDP)上升了43%。最低收入等級組別的市民的收入不斷下跌，但香港整體財富(GDP)卻上升了接近半成。最低收入組別的入息中位數一直下滑，試問經濟增長又如何解決貧窮問題呢？所謂的滴漏理論，又如何繼續談下去呢？

所以，我多年來一直強調，單一政策的措施是無法解決複雜的貧富懸殊問題。正如今天議題內容所指出的大方向，我們必須從根本着手，從既有的施政理念和思維中作變革，檢討過去持守的放任自由市

場、“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因應市場中貪婪和不顧風險的行為進行合理規範和監管；善用政府行為以扭轉自由市場帶來的不公平缺失，建立一套兼顧各階層的全民發展觀；強化和擴大政府的角色，改善經濟結構和發展經濟增長點，重新有效使用政府應有的資源分配角色。

我們建議透過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以達至上述目的。這個委員會應獲賦權檢視整體社會和經濟政策，評估哪些制度和政策是導致貧富懸殊惡化的根源。該委員會應由各個相關政策局、部門、社會人士和相關持份者組成，以便在不同範疇，包括福利、勞工、教育和經濟政策等，制訂扶貧策略和落實計劃。既要從宏觀角度和經濟結構着手，對制度作出根本性的改革，也要訂定明確的扶貧目標，推動和協調各個政策局進行扶貧工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長久以來，政府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嚴重傾斜，加上經濟轉型等因素，導致貧富懸殊的情況越趨惡化，貧窮人口不斷上升，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加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設立高層次委員會，從政府的施政理念和原則、政策的制訂，以至措施的落實等層面，進行全面檢討和深入研究，並透過公眾參與和諮詢，制訂全面、兼顧社會各階層和可持續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策略，有效分配社會資源及縮窄貧富差距，同時配以適切的扶貧措施，讓社會各階層均能真正分享經濟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健波議員發言，然後請王國興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貧富懸殊的議案過去在立法會已經辯論過很多次，很多議員都提出過不少有意義的建議，雖然香港各界很重視這問題，但貧富懸殊卻越來越嚴重。

貧窮問題的成因相當複雜，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不過，我想指出，社會討論貧窮問題時，往往較少提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便是政府缺乏針對性的措施，解決由新移民衍生出來的失業和貧窮問題，因而令貧窮問題惡化。

今天我提出的修正案，就是要促請政府從貧窮問題的角度，檢討及研究人口政策。不過，我想強調，政府的任何檢討和研究都不應影響家庭團聚的大原則，因為這是基本的人權，理應受到肯定和尊重。同時，我要強調，移民政策只是貧窮問題的其中一個根源，而我以下的分析，是要探討問題的成因和解決方法。

根據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的數字，由2000年至2010年首6個月，即約10年的時間，持單程通行證(“單程證”)來港的人數超逾50萬人，相等於現時香港700萬人口的7%，即每100個香港人，便有7人是在過去10年間持單程證來港的。入境處的數字亦顯示，這些持單程證來港人士中有72%，即約36萬人，是15歲及以上人士，他們的年齡中位數達27歲至30歲。以今年最新一季，即第二季數字為例，在10 698人持單程證來港人士中，有8 599人，即八成人是15歲及以上。

就這些數字，我向大家再提出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第一是他們的教育程度，以及第二是他們在內地的工作經驗。

在這三十多萬15歲及以上的單程證人士中，我發現有九成人的教育程度是在中學或以下，包括有七成人，即約25萬人是中學程度；有兩成人，約65 000人只有小學程度。

第二，我想分析他們在內地的工作經驗，這些持單程證人士有近一半人，約176 000人，在內地的工作只是料理家務者。

從以上的數字看來，約有七成人來香港時已經超過15歲，平均年齡更達27歲至30歲，教育程度一般是中學水平，而且有不少人過去只是料理家務者。由於香港已進入知識型經濟，以他們的條件，實在難以相信他們可以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事實上，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就持單程證來港人士的研究發現，平均有五成被訪的單程證人士表示，在工作上遇到適應困難，需要其他人協助。

研究亦發現超過八成被訪者的主要收入來源都依靠工資，但調查同時顯示，他們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平均只有6,500元至7,700元不等。從以上的數字看來，政府絕對有需要深入研究由人口政策帶來的失業及低收入問題。

過去，社會總是迴避有關問題，相信是擔心討論新移民問題，便會觸及家庭團聚，甚至是歧視問題，所以，社會一般都不想把人口政策與貧窮問題一併討論。我相信，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不應受任何影響，但亦不代表政府是無事可做。同時，“斬腳趾避沙蟲”的態度無助解決問題，反而會令問題日益惡化。

我認為如果政府能夠承認及正視問題所在，最低限度可以做好評估和規劃的工作，例如可以預早調查輪候來港人士的資料，然後做好規劃及準備的工作。

我想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天水圍被稱為悲情城市，由貧窮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部分新移民和領取綜援家庭都居住在天水圍，政府沒有及早正視這問題，做好社會的配套工作，區內亦沒有足夠的基層工作崗位，居民不容易外出工作，而且社區的支援亦嚴重不足。在貧困無助的情況下，整個天水圍都瀰漫着負面的情緒。

直至天水圍多次發生慘劇，政府才汲取教訓和正視問題，為區內居民引入不少輔助就業及社區支援設施，例如推出交通費支援計劃，跟香港賽馬會合作在天水圍設立一站式就業及培訓中心，以及開設電話投注中心等。這種種社區配套，都有助居民找到更多工作。此外，更有居民團體建議政府應針對區內情況，發展本土經濟，從而為社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相信當有關的建議逐一落實後，在某程度上可以有效紓緩貧窮及衍生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如果政府早洞悉先機，正視新移民衍生出來的貧窮問題，在新移民大量遷入天水圍之前做好準備工夫，天水圍可能無須淪為悲情城市。我希望透過這個悲情的例子，說明政府面對有關情況時

要認真處理問題，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實際上應該怎樣做，當然有待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討論和研究，我們最重要的是認清問題的方向。

此外，原議案建議設立高層次委員會，專門統籌有關貧窮問題的研究和制訂策略。我同意有關的建議，不過我認為單單重設扶貧委員會並不能解決問題，新的高層次委員會應該同時兼備扶貧委員會及經濟機遇委員會的職能，否則，再高層次也無補於事，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

過去，雖然扶貧委員會集中研究預防及紓緩貧窮問題，但對因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帶來的貧窮，卻是無法處理。所以，新的高層次委員會應該具備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的職能，才可以就經濟發展的問題，向政府提出高層次的建議，例如政府在發展六大產業時，委員會可以提出建議，爭取創立更多合乎需要的職位，這才是解決根源問題的最佳方法。

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就今天“紓緩貧富懸殊”議案的辯論，我提出了修正案。在修正案中，我特別指出政府長期以來偏重、依賴地產和金融業的發展，而忽略發展其他行業，而且整個政府均沒有推行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在本港加速走向知識型經濟發展的同時，缺乏經濟發展策略的調整，導致本港在經濟轉型中無法為基層和低技術工人創造適切的職位。另一方面，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令低下階層得不到合理和適當的照顧，同樣加劇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還有，貧富懸殊這個深層次矛盾已經困擾本港多年，但政府一直未有重視，連早年專責研究如何處理本港貧窮問題的扶貧委員會也解散了。因此，我在修正案中促請政府正視並訂定扶貧措施及減貧目標。以下我將會從發展多元產業、社會資源分配和訂下減貧目標3方面提出我的建議。

代理主席，我今天帶來了工聯會去年下旬發表的“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綜合建議書”(“建議書”)，這本建議書已經送交政府，我不知道局長有否看過，如果沒有，我稍後會再送一本給他。這本建議書促請政府制訂一個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

代理主席，這已是工聯會在11年裏第三次提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在11年前的1999年，我們已向特區政府提交“香港推行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理論和建議”報告書。在8年前的2002年，我們再向特區政府提交“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具體政策建議書”。這份已是第三份了。十一年來我們提交了3份研究報告，但很可惜，到今天為止，政府仍然只管在聽。

代理主席，工聯會在去年的建議書中指出，過去10年，香港經濟增長銳意走向知識型的發展格局，經濟轉型成為特區政府及多個相關行業關注的主要議題。在這種經濟形態之下，知識型經濟是不能逆轉的發展大勢。對此，工聯會進行了嚴謹的調查研究，以瞭解知識型經濟對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知識型經濟難以為本港提供較高就業率，最終將會使結構性失業長期困擾本港社會。以本地四大經濟支柱中的金融業為例，1997年金融業產值佔整體生產總值10.3%，創造了170 600個就業機會，但是，到了2007年，金融業佔整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上升至19.5%，而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只有192 700個，只佔就業人數5.5%。再者，在四大經濟支柱中，很多職位也是專業或半專業職位，實際上能為基層創造的就業大多數只屬服務或銷售性質，甚至只是清潔和保安等職位。事實上，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指出，從1999年到2009年這10年裏，保安員的平均收入由7,284元減至約7,000元，而同期侍應的薪酬更由9,028元減至8,036元。可見員工的實質工資不斷下調。基層工人的收入不斷減少，貧窮人口自然越來越多，試問貧富又怎會不懸殊呢？

因此，工聯會的建議書促請政府採取就業優先經濟發展策略，並具體建議政府要積極發展物流業、旅遊業、環保工業和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動高增值的第三方物流業務，扮演區內物流樞紐角色，開發醫療、旅遊及教育服務出口等產業；另一方面，也全面發揮勞動含量高的產業，包括積極發展酒店、旅舍及支線航空，建立香港分別作為外地旅客及內地國民走入及走出中國的第一站角色，並廣泛推行廢物回收，促進回收再造的環保綠色工業等。發展高增值物流業及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等產業，旨在增加高質素就業人口的收入，既保證特區政府獲得一定稅收，而勞動含量高的旅遊業及環保工業一類的產業則可創造大量適合低技術人士的就業機會，而高收入人口將通過消費支撐飲食、零售、交通等本地經濟，亦會產生帶動的作用。特區政府可從高增值產業帶來的稅收作出合理分配，輔助例如環保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務求發展經濟之餘，亦能達到高就業的目標。

代理主席，在發展多元產業上，本人過去也積極提倡發展本地的小本經濟。以冰凍甜點，即俗稱“雪糕仔”的行業為例，經過本人爭取多年，終於取得突破，政府願意重新發出牌照，讓有興趣者入行，透過牌照養活家人。但是，政府是否應該再邁出一大步，考慮重發適量的小販牌照呢？代理主席，最近亞洲博覽館展出“清明上河圖”，我們看到北宋時的繁華景象也是有小販的。香港今天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為何要趕絕小販呢？小販這個行業其實可以幫助本地的失業者，讓他們最少可以維生，亦有助社會繁榮。為何今天的香港竟不如北宋時代呢？希望局長想一想。又例如香港本來有很多可以作小本經營的公共商場、屋邨街市，然而，我們的政府卻把這些本來可以讓小本經營生存的機會交給領匯，這些錯誤的做法，是否值得政府深思呢？剛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舉出了天水圍等地區的例子，我在此不重複了。

代理主席，在社會資源分配方面，政府未來的主要責任是透過稅收把資源分配到有需要的弱勢社羣身上，所以工聯會一直建議政府應該改革稅制，以垂直公平原則徵收稅款，讓有能者負擔更多。同樣地，對於最有需要的社羣，政府也應給予更多資源，協助他們。

至於減貧目標方面，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2010年上半年貧窮數據顯示，香港貧窮住戶人數有47萬戶，總人數上升至126萬，是歷來最高，不論是貧窮人數還是貧窮率均創出新高。與2009年比較，在短短半年內，貧窮人數已增加了6萬人。在這個貧窮數字中，單是長者貧窮已超過三成，達33.9%。此外，中年貧窮、青年貧窮其實也同樣嚴重。由於時間所限，我不能一一闡述了。我希望政府能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多謝代理主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馮檢基議員提出“紓緩貧富懸殊”的議案辯論，以及陳健波議員和王國興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政府與各位議員一樣，我們十分關注和關心香港的貧窮問題。事實上，貧窮和貧富懸殊問題是很多先進國家和經濟體系均要面對的難題。特區政府一直以務實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從來沒有迴避，我要強調我們從來也沒有迴避。

香港是個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匯集了發展成熟、多元化和國際化的服務業活動，我們僱用了擁有多方面技能和不同技術水平的工人，以及專業人士，他們的收入當然會有較大差距。

隨着本港轉向知識型經濟，對高學歷和高技術專業及管理人員的需求不斷增加，創造了很多較高薪的職位，進一步拉闊了不同階層勞工收入的差距。然而，這是邁向高增值、知識型經濟過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亦是我剛才所說很多主要經濟體系與我們面對相同問題的原因。此外，香港社會有特殊的發展，便是社會結構轉變，例如人口持續高齡化，現時每8人便有1人是65歲以上，20年後這比例會提高至每4人便有1人；另一點是住戶趨向發展小家庭，亦導致較低收入的住戶數目不斷上升。

但是，政府關注的不僅是收入差距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基層和弱勢社羣的實際需要。香港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安全網，協助有需要人士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開支和需要。政府亦在房屋、教育及醫療等4個主要範疇提供了多項免費及大幅資助的服務，弱勢社羣和低收入人士均能同時受惠。此外，我們亦針對特定羣體的需要，包括陳健波議員所說的新來港人士、兒童、青少年、失業人士等，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和支援。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畢議員的意見後，我會作更詳細的回應。多謝。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已經是近數星期以來第三次討論貧窮的問題。很多議員也絞盡腦汁，提出五花八門的措施，希望能使局長及政府加一把勁關心貧窮的問題。代理主席，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些新穎的想法，而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否已經對這個問題變得麻木了？立法會是否真的只是一個“口水會”，除了每天到這裏進行辯論或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責罵一下政府之外，便不能做到其他事情呢？

代理主席，請不要說我過於悲觀，社會上實在有很多跡象顯示，我們對於貧窮問題已變得越來越麻木。代理主席，日前審計署向本會提交了最新一份的報告書，今天大家在各大報章也可看到，很多直資學校、數一數二的名校，甚至是很多同事畢業的學校，也無視貧窮的問題。在這些學校中，有些款項原本是預留給清貧學生的，但辦學團體竟然沒有告訴學生或家長，原來他們是可以申請這些助學金的。校方一方面把預留的資金存到銀行，另一方面卻於每年增加學費。如果連辦學團體對於貧窮問題也變得麻木，這個社會還有甚麼希望呢？

事實上，我們與政府討論貧窮的問題，好像說得口水也要乾了。代理主席，我的助理替我寫了一份講稿，但內容卻是“熟口熟面”的，以往我亦曾談過那些內容。我擔任議員多年——其實不是很多年，但我感覺已有很多年了——每年也有談及這些內容。難道局長不知道嗎？不是的，局長也許能把這些內容倒背如流，但意見接受，姿態如舊。我看不到政府有何改善方法。代理主席，在特首發表施政報告之前，我曾提醒他，現在有很多數據均顯示香港缺乏社會流動。香港大學最近亦做了一項民調，我真希望特首當天能看到該民調結果，但他的回應卻是：“不是的，Ronny，香港沒有這個問題，即使有民調顯示我們的社會流動不但出現停滯不前的情況，更有下滑的跡象，這也只是所謂的‘snap shot’而已。”代理主席，我不知道“snap shot”的中文是甚麼，我想他的意思是說“即時照相”的一個短暫情況。當大家看到數據反映貧富懸殊情況、貧窮家庭的數目、在職貧窮的人數一如我們的年歲般每年遞增，我們應如何解釋這些事實呢？即使我們辦多少次亞運會，興建多少個“西九”，也不能掩飾社會對貧窮問題的麻木，亦不能掩飾我們坐擁億萬儲備，但在關懷方面卻是一個極為“貧窮”的社會。貧窮不一定是指金錢上的貧窮，在關懷別人方面，我們的社會也是貧窮的，我們的良心也是貧窮的。

代理主席，特首在擬備今年的施政報告時，是否不知道存在這個問題呢？不是的。我相信每位議員看見特首也曾提及貧窮的問題，但這份施政報告提出了甚麼建議呢？答案是“關愛基金”。莫說“關愛基金”不是甚麼靈丹妙藥，即使對於改善貧窮問題的方法，也如特首所說的“snap shot”般，政府只是一次過向市民派糖，根本無助於改善結構性的缺陷。代理主席，其實除了“關愛基金”之外，香港還有多不勝數的基金。前數天我們仍在討論“盛事基金”，香港究竟有多少個這樣的基金呢？我這裏有些數據，譬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既然是“投資共享”，這個基金當然要幫助貧窮人士。基金成立於2002年，政府當時期望每年會有400宗申請，而在9年後的今天應有3 600宗申請，但是至今只有943宗申請。

代理主席，大家說商界有參與捐款，沒錯，50億元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我們是非常感激的。除了林健鋒議員之外，今天沒有太多來自商界的議員在席。如果商界機構說他們已捐款予“關愛基金”，便不再捐款予別的慈善團體，那麼社會真是得不償失了。至於這個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有甚麼成員呢？代理主席，很多社福界的人士獲政府委任加入上述督導委員會，他們與社福機構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對貧

窮問題的認識當然也很深，但我不希望因為他們與社福機構的關係，讓人聯想到“關愛基金”的資金最終會全數撥予這些機構。基金內的捐款有多少可以落在真正需要幫助的窮人手中呢？代理主席，我真的不知道。此外，政府指出需要持續運用“關愛基金”的款項，亦需要進行投資，這便說明了面對現時的貧窮問題，“關愛基金”的幫助其實不大。代理主席，我真的認為我們不需要作詳細的討論，我們只需要政府(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湯家驊議員：.....去克服這麻木的心。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貧富懸殊問題備受社會關注，較早前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關愛基金”，而立法會在短短一個月之內，亦提出了兩個相關的議案，可見當局必須正面應對這個問題，積極尋求解決辦法。

去年10月發表的聯合國報告指出，香港的堅尼系數達到0.434，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先進經濟體，較美國的0.408還要高。即使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香港仍排在第18位。

近10年來，香港的經濟雖曾出現波動，但整體上是呈現增長的。我們曾把2001年和2009年的數據進行比較，發現本港按人口計算的平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93,500元增至233,060元，升幅超過兩成，但本港家庭入息中位數在同期的升幅則只有2.94%。可見香港的經濟一直在增長，但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並沒有受惠於香港的經濟增長，亦未能分享到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在這10年間，他們的生活從未得到改善，部分市民的生活質素更有所下降。

這事實正說明了造成本港貧富懸殊問題的關鍵之一，就是香港經濟和生產結構的轉型。昔日香港的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密集的工業，即

使是目不識丁、毫無技能的家庭主婦，單憑雙手和勞力便足以謀生，幫補家計。可是，時移勢易，廠房亦已北移多年，踏入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化社會、知識型經濟，所有行業均趨向專業化，現時再也不能單靠雙手“搵食”，即使保安員或清潔工人也必須經過培訓，護老院的護理人員亦必須接受護理訓練。

這意味着一羣低技術、低學歷階層的勞動人口正逐漸被社會淘汰，同時也意味將會有越來越多人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羣，走進社會福利的安全網，長此下去，將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負擔。

民建聯認為，扶貧工作不應只着眼於如何派錢，而應研究如何才能使勞動力得到工作。因此，政府有必要長遠發展多元化產業，一方面解決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一方面又可提升整體的人口質素。政府在去年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的建議，為香港日後的長遠經濟發展奠定基礎，這方向是正確的，民建聯亦是支持的。一旦這六大優勢產業得到發展，未來將可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如今不少年輕人也面對就業困難的問題，尤其是在金融業和資金匯集的熱門行業，在環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競爭下，這些行業相對上已出現了人才飽和的情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新的就業發展方向，緩解新增勞動力對勞動市場構成的壓力。

很可惜，近兩年來，政府除了落實數幅土地作為教育及醫療產業用地外，其他的措施似乎只聞樓梯響。我們認為，當局應全速前進，積極推動發展這六大優勢產業，就產業人才的需求進行規劃部署，例如撥款提供更多持續進修的途徑，吸納更多人才，尤其是年青人投身六大優勢產業。

除了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外，民建聯相信，發展社會企業（“社企”）在長遠而言亦是一項有效紓緩貧窮的措施，這類企業可以為弱勢社羣創造就業機會，協助他們自力更生。

現時海外不少地方已積極發展社企，香港社企的發展相對上仍然處於萌芽階段，縱使政府表示自2008年起，各個政府部門已實行讓社企優先競投的安排，但規模並不算大。本港每年大概只有不足2 000人從事社企業務。

再者，政府對社企提供資助的年期只有兩年至3年，我們認為政府有必要就社企作出全面的檢討，擬訂發展藍圖，制訂全方位的支援措施和政策誘因，推動社企的發展，使香港的經濟更多元化。

代理主席，港府現時坐擁22,000億元的外匯及財政儲備，完全有足夠能力為低下階層提供適切的扶貧措施，有效分配現時的社會資源。因此，民建聯支持今天的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今個會期由施政報告開始至今，立法會討論的焦點均離不開社會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有關今天促請政府設立高層次的委員會，縮窄貧富差距，我在近期的討論中也有所提及，亦要求政府設立扶貧委員會，綜合處理社會的貧富差距。

有關重設扶貧委員會，我認為有需要說明自己的立場。代理主席，我是前扶貧委員會的委員，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年中完成了扶貧委員會報告後便解散。在2008年年底，本會辯論“紓緩貧富懸殊、協助基層市民面對經濟逆境”的議案時，原議案提出“重設扶貧委員會，研究及提出針對性的措施，以協助基層市民面對經濟逆境”。代理主席，我當時提出修正案，把“重設扶貧委員會”的建議刪除，改為促請政府“增撥資源，加快落實扶貧委員會報告的建議”。由2008年不同意重設扶貧委員會到今天倡議重設扶貧委員會，轉變的並非我對扶貧的看法，而是社會形勢的發展，令我認為有需要重設扶貧委員會。

社會的轉變包括了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矛盾惡化，出現了階級對立和仇富情緒。此外，地產財閥也因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願意在其如天文數字般的利潤中撥出一些資源，以紓緩社會的仇富情緒。還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也提出成立與商界合作的“關愛基金”，以幫助綜援線上弱勢社羣。雖然行政長官認為這是新思維，但我的感覺是與財閥的思維共舞。代理主席，我在此必須申報我是政府委任的“關愛基金”的成員。我只能說，我的學識雖然在周永新教授之下，但我與周教授一樣，對“關愛基金”也有很大保留。同樣，我是在再三考慮後才答允政府的邀請的。

代理主席，我在施政報告的發言中已再三表達了我對“關愛基金”的憂慮，我在此不再重複了。不過，我在發言時已建議重設扶貧委員會，並由扶貧委員會重新開展扶貧工作和管理“關愛基金”的撥款。在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公布當天，政務司司長、同時亦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唐英年先生公開表達了他對“關愛基金”的看法。司長是這樣說的：“委員會其中的主要職能，是針對基金所援助的項目，進行實證的、有系統的、科學化的分析研究，檢討項目成效，並建議哪些項目應該納入政府恆常的社會保障制度之內。”

代理主席，我看到司長這樣為“關愛基金”定位，感覺這也正是過往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在扶貧委員會報告摘要，“委員會的工作”下的建議是這樣的，也包括了：“就扶貧措施的成效進行評估性研究”及“有系統地蒐集數據和統計數字，以加強有關貧窮問題的研究和分析工作”。扶貧委員會工作的具體成果，便是向政府就扶貧工作作具體的建議。日前，本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的交通費支援計劃，便是扶貧委員會當天的建議。

所以，可以這麼說，司長的講話發揮了加強的作用，令我更希望重設扶貧委員會，以便綜合處理與社會貧窮有關的一切問題。即使“關愛基金”未來會扮演扶貧委員會的角色，但我看到它“軟綿綿”的名字，也不禁想起《論語·子路篇》孔子教訓子路的一番話。孔子是這樣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們均希望扶貧工作能夠事有所成。

多謝代理主席。

黃國健議員：對於貧富懸殊這個問題，社會近年作出了很多討論。我相信局長對此也是耳熟能詳的，無須看甚麼資料也可以回答。

代理主席，根據財經雜誌福布斯在今年公布的最新億萬富豪排行榜上，香港有25人上榜。香港如此細小的地方竟然出產了25名億萬富豪，表面上看來，這是很風光的事。不過，讓我們轉而看看另一個數字。在199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476，在2001年急升至0.525，在2006年更上升至歷史新高的0.533，這反映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的。

財富，香港是有的，但只集中於某一小撮人身上。作為一個發達的城市，香港的堅尼系數竟然高達0.533，是全亞洲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看到這個數字，我們還會否因為香港每年有多少名富豪打入世界富豪排行榜而感到雀躍呢？

我想說說，香港現時出現了3種貧窮現象，第一，是在職貧窮。香港的“打工仔女”現時要面對的問題多不勝數，而就業零散化則是大趨勢。即使有一份穩定的長工，也要“捱”長工時、沉重的工作量，以及低收入。有人說，長工的收入較為穩定，的確是穩定的，是穩定的低。

根據樂施會一份名為《香港在職貧窮家庭狀況》報告的分析，在2010年第二季，於在職住戶中，有10.2%屬於在職貧窮戶。即是說，在這些住戶當中，最少有1名就業人士的每月入息低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換言之，每10個香港的在職家庭中，便有1個是在職貧窮戶。報告同樣指出，在職貧窮戶的數字在2005年至2010年的5年間不斷增加，更有20%最低層家庭的收入在這5年內沒有任何增長，他們的收入一直停滯於2005年的水平。

此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在1997年回歸時，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就業人士有178 900人，但到了2010年第三季已增加至215 400人，當中月入少於3,000元的更佔101 000人。雖然政府有推行不少措施，例如低收入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交通費支援計劃及食物銀行等，希望可以改善在職貧窮的狀況，但可惜的是，我們覺得成效只是一般。即使最低工資最快會於下年5月實施，也未必能較大地改善香港在職貧窮的情況。

在最低工資進行立法時，我們工聯會便曾提出修正案，建議在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須顧及以下需要：第一，要防止工資低於綜援的水平；及第二，僱員能足以應付個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生活的必須開支。可惜的是，有關修正案最後未能獲得通過。我們要求在最低工資落實執行後，要盡快作出檢討，務求可以真正改善在職貧窮的問題。

我想談的第二種貧窮現象，是長者貧窮。在香港這個表面上看來很富裕的社會裏，其實有不少長者是倚靠綜援、“生果金”，甚至是撿拾紙皮維生的。事實上，長者綜援一直在所有綜援個案類別中佔最多，在過去10年來，一直佔超過50%。以2009年為例，便有153 448宗長者綜援個案，佔所有類別的53.1%。

由於香港沒有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因此我們可以預見，長者貧窮的情況只會隨着人口老化而繼續惡化。張局長經常說，我們的退休生活是倚靠3條支柱的。但是，在我們看來，卻只有一支“生蟲拐杖”，因為根據張局長所說，我們是倚靠自己的積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及綜援的。就積蓄來說，我們的工人現時收入那麼低，他們能夠維持生活已經“偷笑”，怎麼可能還有積蓄或儲錢，待退休後使用呢？

再說，在強積金方面，在收入那麼低的情況下，強積金必然會是很低的，這又如何能解決退休後的生活呢？所以，最後剩下來的可能便只有綜援。

我最後想談的，是跨代貧窮。談及跨代貧窮，香港最主要的問題是青年人的出路問題。由於我們的產業不能解決青年人的出路問題，因此很多青年人不能透過教育脫貧，導致我們的社會流動停滯不前。我們希望政府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為青年人創造更多出路和更多就業機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想藉着今天的機會，再次感謝局長在上月出席了街坊工友服務處成立25周年的晚宴。當晚一些婦女贈送了一幅大圖畫給局長，該幅圖畫上有一個生果籃，而籃上則盛載了很多東西，包括在職貧窮問題；包括一些婦女因為持雙、單程證的問題而無法取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需要依靠一份綜援來養活兩、三個人；包括一些婦女由於一直擔任家庭主婦而沒有作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供款，在年老時便沒有退休保障；亦包括一些長者因為年紀問題要依靠“生果金”或綜援，但因為他們選擇回鄉退休，故此他們的申請很多時候都不獲批。那羣婦女便把這一籃子的事務送給局長，局長在當天的晚會上亦很好地回應了這些問題。所以，我是很多謝局長的。

所以，我對局長剛才的發言是有同感的。他說政府以至局長也很關注貧窮和貧富差距的問題，所以，他對這些問題從來都不迴避。正如當晚那羣婦女把圖畫送給局長時，局長也沒有迴避，照收可也。可是，當中便存在着一個問題，不迴避並不等於正面解決問題，這才是問題所在。為何我們今天仍要不斷重複討論貧富差距和貧困問題呢？這便是因為政府採取的態度，很多時候即使要面對問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欠缺一個長遠的方法和策略來解決問題。

馮檢基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便是要求政府在政策及處理問題方面作更深層次的處理，以及進行詳細和全面的檢討。我們期望政府不要採取現時處理問題的態度，即今天面對某個問題，便處理這問題。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用更深層次的長遠政策來處理問題。我期望

政府今天可以修正它的策略和態度，因為如果欠缺長遠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政府永遠都要面對着一羣貧困的朋友，他們亦一定會不斷提出各種要求。要解決問題，便應該徹底解決，而不光是在表面上作解決。

剛才局長亦提出了數項問題，他也有所明白和瞭解，例如為何市民會貧窮呢？可能是因為現時欠缺了高薪職位。可是，現時的問題在於政府只是提出了這個社會現象，但究竟有否解釋及處理到為何香港會沒有這些高薪職位呢？代理主席，我想大家也明白，我們亦在議事堂多次討論過，外判化便是其中一個無法提供更多高薪職位的原因。外判化是一個問題，現時政府裏仍然有很多外判工種。外判工種的薪酬較低，亦非常缺乏福利保障，因此，我們隨時可以在外判員工中找到貧窮問題的例子。

就這問題而言，如果我們不從根本解決問題，撤除這樣的外判制度，貧窮問題是會永遠存在的。正如我剛才提出的在職貧窮，這羣市民其實是有工作的，但薪酬卻十分低。即使政府或局長指出現時已經設立了最低工資，對工人已經較有保障，沒錯，最低工資對個人來說可能會有一點保障，但問題在於……請局長想一想，如果以時薪28元來計算，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26天，究竟可以獲得多少薪金呢？款額是5,862元。五千多元對一個人來說，勉強也可以生存，但如果以一個人的工作來支付兩個人的生活，便一定不足夠了，他們一定會陷入貧窮的範疇內。

所以，政府不可以單單說現時已回應了社會訴求，已經設立了最低工資，大家的生活水平便不會太低，因為這是不足夠的。我們經常說要補貼低收入家庭，這才是一種可行的方法，但政府卻從來不予以考慮，只是好像今天回應我們時說，有了最低工資便可以解決問題。最低工資並非萬應靈丹，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工作。我們還需要推行其他措施，例如我剛才提到的家庭補貼。

此外，局長剛才亦提到現時的社會結構已經有所轉變，人口正在老化。局長更指出到了2033年，每4人中便有1人是高齡人士。大家也知道有這些問題存在，但究竟會出現甚麼問題呢？肯定是退休生活問題，但如何解決這問題呢？今時今日所謂的三大支柱，其中一條較為聞名的支柱當然是強積金(MPF)，但強積金是否真的可以解決退休問題呢？其實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當中特別會出現數項問題。第

一，在低收入人士方面，即使他們供款達20年，他們累積所得的金額沒有出現虧蝕便已經算是很好了，因為即使沒有虧蝕，所得的金額也只是很有限，可以養活到十年、八年的生活，便算是很幸運了。可是，現時人類的壽命並不短，正如剛才有人提到人類的壽命是正在增長的。市民到了65歲退休，再經過十年、八年也只是七十多歲，那麼他餘下的數年要怎樣過活呢？所以，這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此外，一些沒有工作的婦女更沒有強積金的保障。所以，我認為如果要解決退休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便需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如果這些問題不獲解決，便永遠有一羣長者不夠金錢使用。現時的長者連告老還鄉也無法做到，便是因為政府在申領“生金果”的居港日數方面不願讓步，只退讓了一點，所以，這些問題便仍然存在。我希望政府可以藉着今天的討論，不要老是以最低貧窮線、綜援、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作為藉口，這些只可以幫助到部分人士，但卻無法解決所有基層貧窮人士的問題。就這數方面而言，我希望政府可以從長遠角度和政策層面來處理問題，不要好像施政報告般蜻蜓點水，每樣事情也“點一點”，或是以“頭痛醫頭”(計時器響起).....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潘佩璆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看到只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這裏，真是令人感到有些“心淡”。局長請別誤會，我並不是說不喜歡看到你，我們很高興你在這裏，也知道你是很勤力的。但是，正正因為只有你在，所以令我們感覺到政府對貧富懸殊問題的基本思維是不會改變的。

似乎政府認為只是透過就業、改善福利便可以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是一個多麼狹窄的看法。關於貧富差距不斷擴闊的問題，剛才有很多同事，以及我過往也不斷的提出過很多數字，因此我覺得也無需要再在這裏提這些數字了，而我相信局長可以把這些數倒背如流。

剛才馮檢基議員在就其原議案發言時一再提出奸商這個名詞，我自己對這個名詞是不認同的，但我並不是說這世上沒有奸商存在。只是，大多數從商的人，他們的經營也是要服從市場的定律。在競爭劇烈的市場內，營商的人往往基於其生存或企業發展的需要而要做兩件事。第一是收縮成本，工資能壓得越低越好，買回來的貨品或原材料越便宜越好。第二是擴大利潤，如果有些東西可在市場上多賣1毫子，便絕對不會賣便宜1毫子；如果一個商鋪可以多收1元的租金，也絕對不會少收1元。只有這樣，企業才能不斷壯大。

正正是因為這些市場定律，才會令無資產的人、無物業的人非常痛恨商界。被減工資，他們會痛恨；買的東西貴了，也是令他們痛恨的原因。所以，奸商這個名詞並不是指個人，而是指制度、市場失效所造成的現象。

香港現在的處境是怎樣的呢？我們看到的現象是社會上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的人手上、被少數的企業控制。窮人的收入越來越少，從很多統計數字可以看到，最低收入的人的薪金正在下滑，9月份樂施會的一項調查也很清楚顯示香港在職貧窮的家庭數目不斷增加。家庭收入最貧窮的10%與最富有的10%比較，兩者的入息中位數的差距達二十七倍之多。因此，問題是越來越嚴重。沒有資產的人要創業，現時的空間事實上也是越來越狹窄，這就是香港社會的現狀。

代理主席，我覺得香港現時的處境真的猶如坐在一個計時炸彈上。這問題不斷的惡化，就好像一個充滿壓力的壓力煲，裏面的壓力不斷增加，裏面的蒸汽不斷要找地方泄出來，如果沒有途徑讓這些蒸汽泄出來，讓這些壓力紓緩，壓力煲便會爆炸，好像炸彈般爆炸。政府的確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而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這議會討論這問題的原因。

當然，改善整體經濟、“把餅增大”，所謂的“滴漏效應”，我們也相信是有其作用的。教人釣魚，投放多些金錢發展教育，投放多些金錢到培訓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增加多些福利予窮人、老人家、殘疾人士，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說到最後，還欠一樣東西，還欠甚麼呢？便是財富的再分配。我相信很多人談起這事都會很害怕，好像要向他們“打荷包”一樣。但是，我們要考慮到，這壓力煲的壓力若不紓緩的話，最後爆炸的時候，縱使有多少財產也沒用。

相對於很多其他先進國家，香港的稅率是非常低，而我們所採用的是一個偏平的稅率制度。我覺得有錢有能力的人應多付一點稅，我們若採取一個累進稅制的话，將會大大改善現時的情況。透過制度的改變，令社會上有能力、較富有的人負擔多一些公共開支，幫助多一些貧窮的人，我相信很多人也會樂意這樣做的。

我覺得我們今天正處於一個變革的前夕。隨着香港社會的民主化發展，隨着雙普選的來臨，窮人手上的選票最終會改變我們的社會。我相信，不論政府是選擇積極地多做些事，還是選擇做鴛鴦，這個變革都必定會來臨的。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馮檢基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其實很簡單，他覺得單憑局長一局之力並不能解決全港的貧窮問題，一定要集結跨部門及不同階層，全民一起參與，這樣才可以有效地解決貧窮問題。然而，很可惜，局長經常“拍心口”說甚麼也由他來辦，我不是批評他不辦事，而是在現實處境中，即使他真的如何努力，有很多事情也並非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可以解決到，而是一定要大家合作一起做。所以，馮議員提到紓緩貧富懸殊的措施要由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來做，其實是符合實情的，即不可能再憑一位“拍心口”的局長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美國的金融雜誌指出，在全球最富有國家及地區排行榜中，香港目前排行第七位，這真是十分厲害，但我不知是否真的，為何會排名第七位這麼厲害。然而，我看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卻十分嚴重。我想大家今天也曾提及堅尼系數是0.533，我想我在立法會每次討論這個議題時也提及這個數字，但局長卻好像無動於衷，政府同樣是無動於衷。我希望政府真的能正視貧富懸殊的問題。

之前成立的扶貧委員會，其職責包括了研究及瞭解貧困人士的需要，預防貧窮、紓緩貧困、推動自力更生，以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鼓勵社會參與，界定政府、社會福利界與民間的角色、推動公私營機構合作、運用社會資本、改善貧窮問題。事實上，前扶貧委員會最後也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是，在提出意見後，似乎局長便真的好像“拍心口”般，說都由他來做，於是便把波全部接下，有些則傳了給民政事務局。於是，他把扶貧委員會當作壽終正寢，這便變成不是全民一起解決的貧窮問題，不是大家共同努力地消滅貧窮，而只是憑官員的

一己意志，覺得自己有能力解決云云。我並非說局長沒有做事，他有做一點，例如兒童發展基金，以及現時推行的交通費支援計劃。然而，成效如何及當中有甚麼細節，我們不知道。有關長者、弱智人士的宿位，他也做了一些工夫，但卻做得不夠。他不是沒有做事，但問題是不應該這樣處理，而是一定要大家一起努力來面對，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環觀世界上出現的貧窮問題，不外乎數個大的處境。第一個處境，有些地區很貧窮，原因是戰爭，例如北韓無緣無故發炮攻打南韓，它本身可能是要依靠這些恐怖的威脅來使國民團結。北韓的人民真的十分貧窮，因為經常要面對戰亂。我曾前往北韓，看到當地情況真的感到心酸，那些小孩子沒穿鞋在山上和街上四處走；到工廠區參觀，那裏的製成品很美，但他們所穿的卻是破爛的衫褲，這些便是戰爭造成的。

第二個問題，是政治上的獨裁，有很多地區、國家是實行獨裁的。

第三個問題，是人口太多。我們國家有很多人口，達13億。所以，有很多人無法獲得照顧，因而很貧窮，這是情有可原。然而，問題其實同樣是……國家在富庶時，中央政府一直在說要減貧，要研究考慮一些措施，看看如何幫助農村、改革農村及農民的生活。

還有一種情況是政府貧窮、沒有錢，政府入不敷支，還拖欠債項，有些國家甚至差不多要破產。因此，國民便更難期望有飯吃。

然而，看回香港的情況，有沒有戰爭呢？除了民主派及建制派的“口水戰”，有甚麼戰爭呢？我不覺得香港有甚麼戰爭，那是沒可能的。是否獨裁呢？當然，現時的特首並非由我們選出來，但最低限度立法會也有一半議員是直選的，我們也能作出一些監察，這也不是獨裁的。人口太多嗎？對，人口是多，我們地方雖小，但也只有700萬人，最多也只會上升至七百多萬人，人口並非多得像印度、中國大陸這麼多。政府是否貧窮呢？當然不是，政府有很多錢，有着數萬億元儲備，要派發也派不完。但是，很可惜，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重。

根據社聯的資料，我們有126萬名貧窮人士，這是很厲害的。這個數字顯示，我們五分之一的人口——即5人當中，便有一位是貧

窮人士。然而，香港沒有出現像其他國家般的處境。所以，代理主席，我不明白為何政府還覺得局長是萬能的、局長是很棒的，他也繼續說甚麼事情都由他來做，為何不重組扶貧委員會，讓社會人士、各界不同階層的人士一起參與，在不同範疇共同解決問題呢？還有，如非透過跨部門的協作，同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當中的問題涉及了教育、就業、居住、疾病，以及儲蓄，這些都是貧窮的元素。如果這些也做不好的話，很多人最終也不可能有的生活。這些問題也並非單憑勞福局便可以做得到，而是一定要由不同階層、不同專業及不同人士共同努力才能解決的(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黃成智議員：所以，我希望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我當了議員兩年多，我發覺每隔一段時間，同事便會提出有關貧富懸殊的議案，我自己也提出過修正案，議論香港的貧窮問題。我跟本會的同事一樣，都有指出貧窮人口上升了多少，他們的生活面對甚麼困難。此外，大家也引用了不同的數字，指出香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亦提出過不少建議，希望可以紓緩貧窮人士面對的困難。

大家如此喋喋不休，可以說已經說得有點厭倦，差不多已沒有甚麼新意，但為甚麼我們仍要再提呢？代理主席，我發覺這兩年來，特區政府的態度最初是無動於衷，後來終於是明白了，但卻反應緩慢，而且力度不足。

代理主席，我今天主要想提出兩點，第一點是與通脹有關。早前，美國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措施，對環球市場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香

港只是彈丸之地，自然不能例外。政府於上周五推出遏抑物業投機的新措施，把熾熱的樓市略為降溫。但是，對於社會上的貧窮人士，我相信未來一年生活上的最大挑戰是通脹升溫。

早前，政府發表《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經濟報告》，指出隨着本地成本回升，美元轉弱和全球食品及商品價格高企，繼續推高香港進口貨品的價格。在這情況下，通脹在未來一年將會繼續攀升。隨着美國新一輪的量化寬鬆措施，更多資金湧入亞洲區，未來一年的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將會有更大的升幅。

我們從上星期公布的10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為3.1%，但在各類消費項目中，低收入基層人士所面對的電力、燃料及水的消費物價指數升幅，是3類消費物價指數之冠，達22.1%。其次是食品，按年上升5.6%；而我們下星期還會在這裏討論巴士加價的申請。有經濟學者預期，除非外圍經濟“爆煲”，否則香港的通脹勢難下調，明年年中的通脹率輕易升至5%至6%。可以預期通脹惡化，生活迫人，而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定是社會上的基層人士。

反觀內地，今年7月以來，因為受多種影響，以致農產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而且逐月攀升，加重了民眾生活的成本，亦招致民怨叢生。上周，國務院終於推出措施。溫總理宣布推出4項穩定物價措施，以保障民眾生活，當中包括對低收入家庭發放臨時補貼，增加對大中專院校學生的食物津貼，以及提高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工資的標準。數天後，國務院再“出招”，推出16項措施穩定消費物價的總體水平。代理主席，我引述內地的措施只是想點出，內地掌握了通脹情況，“出招”快而準。我希望特區政府亦能同樣緊貼社會脈搏，緊貼民情，作出一些具前瞻性的反應，不要像遏抑炒樓般後知後覺。既然我們預期通脹將會不斷升溫，對基層和貧困人士的生活造成影響，政府便有需要盡早採取應對措施，但亦要維持高度彈性。其實，政府無須一定要待每年財政預算案或施政報告才“出招”的。

代理主席，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關於高層次的減貧委員會的。過去進行議案辯論時，我亦曾發言表示支持重設扶貧委員會，由當時擔任委員會主席的財政司司長重新領軍，因為他掌握了香港的資源分配，亦最清楚香港的財政實力。今天，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提出由政府設立高層次委員會，檢視整體社會情況和經濟政策，評估哪些制度和

政策是導致貧富懸殊的根源。這個委員會不應單由勞工及福利局組成，還應該由各個政策局、部門、社會人士和相關的持份者組成，以便在不同的範疇，包括勞工、福利、教育及經濟等政策提出扶貧的策略和落實計劃。既要從宏觀的角度和經濟結構着手，亦要對制度作出根本性的檢視和改革，訂立減貧的目標，推動和協調各個局的扶貧工作。我認為馮議員的建議很有道理，至於政府最後採取哪個方法，我會持開放的態度。但是，代理主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切實、迅速及大力地去做，而不是像過去這段時間般，只是採取一些蜻蜓點水式，甚至是小恩小惠式的做法。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偉明議員：代理主席，就着這問題，我有感而發想談談數點，其實很多同事也曾提及。

代理主席，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老實說，很多同事在立法會辯論中已多次提及，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或紓緩貧富懸殊的問題。其實，就這些解決的措施，我們已在立法會辯論中達致共識，但當中大部分的意見，政府仍沒有採納。我們經常在議事廳跟張局長碰面，如果政府仍然抱着這種態度，我相信在未來日子裏，我們仍會跟他不斷討論這個議題。屆時即使我們不感厭倦，可能張局長對這問題已感生厭，因為我們所提出的意見也是跟之前差不多的。其實，張局長稍後的答覆可能也是之前的答案。他這份稿件應該是最環保的，因為基本上都是這些答案，極其量只是改動一些數字而已。

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是關乎政府的決心。很多時候，我們感到政府在處理貧富懸殊的問題上欠缺決心、畏首畏尾，不知道政府真的不懂怎樣做，還是不敢做？我希望局長答覆這問題。

每次談到貧富懸殊的問題，亦要提到“關愛基金”。我們是歡迎設立“關愛基金”的，“關愛基金”設立的目的是填補安全網的不足，我們上星期已曾討論這項議題。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委員會”）的組成是來自各方面，與其有這樣多人組成委員會，為甚麼不提升委員會的層次，組成一個更高層次的扶貧委員會呢？這正是大家的期望。

我們認為要改善貧富懸殊，並非一時三刻便能做到，而是一項長遠和浩大的工程，不能單憑張建宗局長一人之力便辦妥，是需要其他政府部門互相配合的。

我們認為與其花這麼多精神推行“關愛基金”，倒不如提升層次組成一個扶貧委員會。雖然我們歡迎政府成立“關愛基金”，但它的用途越多，計劃做得越好，是否證明現時的安全網或社會福利制度存着很多漏洞呢？

今天的報章報道，長遠來說可能會把“關愛基金”納入社會福利體系中。我不知道這內容是否屬實，如果是這樣，為何我們不是直接檢視、處理社會福利制度的漏洞，而要大費周章成立“關愛基金”呢？話說回來，在現階段，有這基金總比沒有的好，但希望政府聽取我們的意見。

此外，有關減貧目標的問題，我的同事王國興在修正案中提出，要求政府訂立一個具體的減貧目標，工聯會對此是同意的，這也是我們一直的想法。如果我們不界定減貧目標，將來便不知道所採取的扶貧措施是否有成效。當訂立目標後，我們才會知道能做到多少，如果做不到，我們可以檢討、改進，否則我們便像一艘在茫茫大海飄流的船，不知道往哪方向走。

我們認為政府要制訂一個減貧目標，而在制訂之前，必須訂立貧窮線。但是，政府一直強硬地拒絕這種做法，認為它沒有確實的標準，但我們覺得政府實際上是在掩耳盜鈴，逃避社會貧富懸殊的事實。我們認為如果政府仍繼續逃避，貧富懸殊的問題便永遠得不到適當的紓緩。正如潘醫生所說，這問題是一個炸彈。

最後，我想談談產業政策。其實，對基層勞工最重要的問題是，現時的工種不多，工人很難找工作。當然，我們不希望最低工資降得越來越低，在工人就業情況上，如果政府不開展新的產業，製造新的職位，我相信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政府特別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儘管在六大產業中的環保產業能吸納大量低技術勞工，但到現在也只能作出1%的貢獻。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不要自設限制，指工業或某些產業不能在香港發

展，而只發展高科技或金融產業，否則香港工人的職位便會越來越少(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葉偉明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立法會不斷討論扶貧減貧、貧富懸殊的問題，每年都在討論，已討論了很多次。但是，由於政府在決策上和施政理念不變，我們便只有個“講”字，而政府也繼續只有個“講”字。今天局長在這裏恐怕又要浪費半小時或以上的時間，長篇大論的，一如既往的回應我們的問題。完全沒有新意的，他多次的回應也是一樣，上星期的回應與現在的回應也是一樣的，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上星期劉健儀議員提出補破網，他的答覆與今天的答覆恐怕也是一樣，因為他是技術官僚出身，根本不是一個決策官員。好了，即使他是決策官員出身，但由於他的“老闆”的思維方式有問題，也是死症。這是香港的絕症，我必須告訴你。

那怕有一天如潘佩璆所說，民主化了，一人一票了，窮人有選票了，那麼便有你好看了，但還要特首是我們選出來才行呢，“老兄”，對吧？在西方社會或先進的文明國家，大家爭論的是政策要靠左一些還是要靠右一些、要多給些社會福利還是要多些經濟發展。最後，是由人民決定應由保守黨還是工黨執政。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還在爭論何時有普選、普選有甚麼好、功能界別應否消除，全是吃飯與“吃屎”的爭論。你說怎可有希望？基本上是死症，不過我們沒辦法，還是要不斷討論。你們說貧窮與貧富懸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混為一談。這論調真是荒謬。貧窮最醜惡的特色就是貧富懸殊。魯迅曾經說過(我三番四次說過這話，我希望建宗兄你能記入腦中):“人類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現在阻礙這前途者就是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但我們沒辦法踏倒他。是不是令人氣憤呢？在其他國家，他早便已被人推翻下台了，對嗎？但是，我

們沒法打倒他，因為他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他代表的是一個專權政府，對嗎？

理論上，香港人的物質並不匱乏的，但問題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財富過分集中。這些已是常識的問題。但是，荒謬的是，政府扶貧政策的核心價值基本上仍然是“大市場，小政府”那樣落後於時代潮流的思想，提出的建議不外是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者提供工作誘因和為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再培訓等，讓他們自力更生。這些以工作福利來取代福利的廢話，其實是敷衍塞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好像我們剛剛有些議員說般，口惠而實不至，小恩小惠，沒有觸及根本和結構性的問題：財富分配不均、財閥壟斷、官商勾結吧。政府說以市場作主導，負責的官僚，例如你老兄，甚麼“物質”、“經濟”的掛在口邊。這是迷思，不能解決的。

我們的社會是“以不足奉有餘”，只有單一經濟思維。財團財閥及你們這些特區官員的這種做法只會令小市民陷水益深，蹈火益熱，不但是水深火熱那麼簡單。

今天我們還是要重複舊的論調，我們也很責備自己。為何我們也沒有新意？工聯會、我們及馮檢基等，全都在重複那些東西，而待會兒你老兄又會重複你的論調。說得難聽點，真的是在浪費生命啊。生命有限，小弟最近身體差，故此發覺性命很重要，但一天未氣絕，便勝負未知，所以一定要“鬥長命”。

除《基本法》明訂不能不變外，資本主義是否真的金科玉律，不能改變呢？大家看看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當時是實行資本主義。美國社會那時幾乎崩潰，人們在華爾街跳樓，許多人失業。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新政很簡單，就是把資本主義調整、改稅制、增加社會福利、製造就業。就這麼簡單，但這樣能令美國起死回生了，老兄。那時已不是“大市場，小政府”了，改變在1930年代也出現了。在1941年，羅斯福總統更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最“頂癮”的自由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飯也沒得吃，工作朝不保夕，又匱乏、又恐懼，一個社會試問又如何能夠和諧呢？

再說遠些，二千多年前孔夫子周遊列國時，他覺得三代，即春秋戰國之前，才是真真正正一個大同世界，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種理想要二千多年後，在北歐若干國家和北美的加拿大才出現，才真的看到男有份，女有歸，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別的人們變成了這樣的社會，真的是禮失而求諸野了。

還有，我不知道局長對社會民主主義有多少理解，若他不理解我便送本社民連的政綱給他看。全部都很簡單的，沒甚麼大道理。我旁邊這位老兄是馬克思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前是托派，但他現在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連“長毛”也投降了，不要說是投降，說退卻吧。退卻的原因是甚麼呢？這種思想退卻是因為替小市民請命才更有效果。我的意思是，若我們提倡共產主義，他們不把我們殺了才怪呢，對吧？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已經無話可說了，因為今天的辯論內容已很清楚，我還是從身邊的事情，由立法會說起好了。話說有一天，我來到這裏在樓上示威，其後被拉到樓下一個房間內。我當天還要趕稿，當時擡頭一看，見到董建華，當天是答問會，他正被很多議員圍攻，質問他扶貧怎麼能沒有準則。他卻說不用，政府只是扶貧而已，不用訂定貧窮線。我立即寫了一篇文章，說道如果你走進一間醫院，醫生既不替你量血壓，也不給你探熱，就這樣便處方了一些藥物給你服用，你會服用那些藥物嗎？當然不會，對嗎？我寫道：相當可惜，我們這間香港大醫院是沒法離院的，一旦入院便要留在這裏。

事隔已很多年，我記得當年是1999年，距今已有11年，我們另一位特首，踏着董建華先生的屍首、昂然吹着口哨、唱着國歌上任的曾蔭權，到了今天又是以此一論調，派遣下屬來到這裏，因他現在已不敢再說這令人臉紅的話，而是交由你們再次說出：沒有貧窮線也成，濟貧是不需要貧窮線的。代理主席，試問無規矩何以成方圓？其實，有或沒有貧窮線的確會帶來不同的量度，這是事實，但始終要有一個量度的準則，或多方的準則，沒有量度準則的意思是甚麼？那便是政府無需負責，對嗎？如果訂有貧窮線，那便意味我們要在若干時間內令這條線消失，或是令到在這條線以下的人流動到這條線以上，就是這麼簡單。你無須在這裏偷換概念，辯稱不同地方訂有不同的貧窮線。你今天作為香港一名為政者，卻不能提供一條貧窮線，用以向人民作出施政的承諾，以作自我督促，那麼該怎麼辦啊，“老兄”？這才是整個秘密的所在。

各位，我們擁有的財富，亦即香港社會擁有的財富可說是名列前茅，剛才已有人讀了出來，如果按人均收入計是排名第七。我們的貧富差距則差不多排名第一，那是第一和第七之比。

各位，在這個議會裏，不同黨派均提出了各自的主張，我們都要提出個人的主張，我們是要對選民負責的，對嗎？這個政府卻不用如此，這個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讓我再回頭訴說立法會內的事情。立法會是公帑資助機構，你們帶頭做了些甚麼？在1999年，董建華不知聽了誰人的進言，大概是梁錦松吧，他主張與西方看齊，實行衡工量值，必須“cut cost”，即削減成本。

現在立法會也是如此。那天我碰到一位在這裏擔當外判清潔工作的女士，她跟我說：“梁議員，請你幫我爭取一下。”我詢問有甚麼事，她答說以現時的工資計，她時薪不足28元，只有25元。原來政府是採用平均時薪計算的，聲稱市場的平均時薪是25元，所以便支付25元，那麼立法會豈不是和你們一同犯罪？因為是政府撥款給我們的。還有同工不同酬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同事都不願升職，因為一旦升職和簽立新合約，約滿酬金便會由25%減至10%。你們究竟是甚麼物種？你們把身上的毒菌都傳來了立法會，以你們的施政方式支配我們的財政政策，按照你們對社會的看法，便是不可讓窮人得到溫飽，否則他們太過清閒便會跑出來示威。試想那病情是多麼的嚴重。一個本來應該秉持社會公義、濟弱扶傾的執政團體，卻帶頭作出此等好事，打貧苦大眾、勞工階層的主意。“毓民兄”說得對，“以不足奉有餘”，這才是問題的重心所在。

工聯會的同事說，不要搞高科技，在知識型經濟下，勞工階層很悲慘，這其實全是廢話。我想請教一下，香港有甚麼高科技？高增值倒是有的，那是甚麼？便是做其“炒家”，看準大陸和美國的量化寬鬆措施，乘機“大炒特炒”。搞工會活動的人不應牙牙學語、拾人牙慧，我們有從事過一些甚麼高增值、高科技的物事嗎？說甚麼知識型經濟，我剛才跟外面的記者說，如果是知識型經濟，便不會有越來越多女子擔任記者，給人壓低工資，也不會有人擔當相同的工作卻給削減了工資，甚至是工作更繁重卻反而得到更少工資，知識不是有價的嗎？這是哪一碼子的知識型經濟？根本就是賭場式經濟，所有人也在政府的輔助下從事賭博。李嘉誠、“四叔”等是賭局的大莊家，大陸官僚和太子黨中人也是大莊家，政府則鼓勵人們賭博，對於沒有本錢賭博的人生活越見困苦，則完全不予理會。問題是，我們不能普選特首。
(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梁議員，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今年新一屆的立法會會期已經開了數次會議，除了其中一次之外，每次我們也討論與福利、扶貧有關的議題，可見議會裏的同事已經有很大程度的共識，感受到貧富懸殊的問題是如何嚴重，所以才會導致這個現象。

今天這項“紓緩貧富懸殊”的議案，可說是所有議題的根本，所以其實在之前數次會議及施政報告辯論中，大家已從多個角度探討過這問題。我真的很希望張建宗局長不要像剛才某些議員所說，每次也是行禮如儀，到這裏聽了一輪意見後便像留聲機般，不斷重複空洞的說話。

代理主席，今天提到貧富懸殊，代理主席也記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教育是減少跨代貧窮的治本之道。良好的教育有助提升下一代的質素，增強他們在知識型社會的競爭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引述完畢)所以，政府本應大力投放資源於教育，但我對特首在施政報告中的這句說話的確是感受尤深。記得在我的求學時代，要進入一些好的學校，純粹視乎考試的成績，不論貧或富，機會也是均等的。但是，今天的情況大大不同，因為升中試已被取消。現在如果你想進入一些好學校，一是要繳交每年4萬至6萬元的學費，或是搬到學校附近來居住，又要視乎某些可以讓你取得較高錄取分數的方式。代理主席，問題是富有或經濟狀況較佳的家庭對下一代的栽培，當然跟一些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有很大的差別。簡單來說，我聽聞有些小一、二的學生，暑假已經要到歐洲遊學，但有些住在水圍的中七學生，甚至連文化中心也沒有到過。

我們看到，如果政府並非口惠而實不至，特首在施政報告既然有如此論述：“教育是減少跨代貧窮的治本之道”，但我又看不到他做過些甚麼。如果富有家庭與清貧家庭的下一代的起步點落差不斷擴大，而不是將它拉近，我看不到如何能貫徹以知識來脫貧這論述。

說到大學學位便更是乏善足陳。一萬四千五百個資助大學學位已是多年不變，今年便增加了380個，即使施政報告表明教育是扶貧的重要治本之道，也只是增加了380個而已。

如果一個清貧的中學生爭取不到這14 000至15 000個學額，可能要借較高息的貸款，來修讀副學士學位或自資的學位。他們一畢業便

要背負以10萬元計的貸款和債項要他們償還，他們的脫貧之日將會是遙遙無期。

代理主席，根據社聯的最新數字，自2001年起至本年度，貧窮青年的人數急升了兩成，由144 000增加至176 000。如果青年也面對如此嚴重的貧窮問題，他們作為社會的未來，我的確有很大的擔心。

代理主席，當前最重要的，是設定一些減貧指標及重設扶貧委員會。自1991年起，政府再沒有發表福利白皮書，五年福利規劃亦已絕跡。取而代之的是所謂“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其實這項所謂“長遠規劃”的諮詢，每次都會有團體苦口婆心地表達意見，但政府卻沒有展現出任何承擔來訂立短期、中期及長期的目標及社福規劃，以貫徹及落實這些好意見，政府仍然是見火撲火、見招拆招。我最後忠告政府，這樣的做法只會使貧富懸殊的情況越來越加深，也是造成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及美國傳統基金會在今年1月20日公布一年一度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自1995年起連續16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對於香港多年獲得有關殊榮，我們也要同時反思，因為在“大市場，小政府”及“自由市場”等經濟理念下，香港背負成為全球先進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最為嚴重的沉重代價。其中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去年10月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香港作為全球27個先進經濟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最為嚴重的地區，我不再談甚麼堅尼系數現時超出警戒線等數據了，大家也說了很多。

在本會，對於貧富懸殊的問題，大家剛才發言時也指出這特別是我們近期經常討論的一個議題。當然，張局長剛才在發言時也說過，政府從來沒有迴避貧富懸殊的問題。我相信政府不單沒有迴避，而且還推行了一些措施。但是，為何市民仍然覺得香港的貧富懸殊現象越來越嚴重呢？我覺得因為基層市民現時感到無論如何努力，他們的付出與收入總是不成比例。相反有些人透過資本便輕易得到更多的財

富。這便是我們俗語所說的“錢搵錢”。在這樣的情況下，貧富懸殊不斷加深，帶來社會矛盾，仇富仇商、不滿政府的情緒不斷湧現。

所以，從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政府的扶貧工作要深得民心，必須有賴社會政策理念的改變。缺乏理念的改變，根本走不出現有福利政策的框框。最近政府終於同意在全港18區全面實施交通費支援計劃，這項措施其實是我們一起爭取多年才落實的。我記得扶貧委員會當初提出這項建議時，政府是“耍手擰頭”，認為沒有這樣的津貼計劃。我們後來說需要有一些措施，因為交通費是如此昂貴，特別對於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市民而言。扶貧委員會最終在唐司長帶領下同意挑選兩個區——最偏遠的兩個區(東涌及天水圍)——推行及嘗試一下，進行試驗計劃。在嘗試後，我們就像把腳伸了進去後再把門撐着，把兩個區增加為4個區，然後再由4區變為現時的18區，計劃便是如此形成的。雖然爭取優惠是有其過程，大家成功爭取了便會感到不以為意，但我覺得這項措施背後隱含的政策意義其實是很深遠的。局長，雖然現時這項政策只先推行3年，但我估計在3年後也難以把它取消。當然，屆時誰擔任局長，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這也是很難取消的。而且，它背後的深遠意義便是走出了社會工資制度的第一步。我們很少用這個名詞——社會工資，工資大多是由僱主付出，但這是社會工資。

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下，不少僱員的工資水平是永遠追不上物價的。工聯會的代表剛才也強調這方面的很多數據、資料，指出僱員是難以應付必要的生活開支的。很多僱員最終也可能要以借債來維持生活、節衣縮食等，最後也可能會失去工作動機，因為怎樣努力也維持不到生活，也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使能賺取工資，也不足以糊口，最後便惟有依靠綜援。所以，如果要及早主動協助他們填補市場工資與基本生活需要之間的空隙，使他們能夠繼續自力更生，交通費支援計劃便採用了及早介入協助這種方法。確立社會工資這套理念，政府才有可能在現有就業支援計劃的基礎上再推出更多保障市民基本收入的措施，避免貧者越貧。

除了社會工資之外，福利可攜性、稅制調整、發展新工業等政策理念，都是政府必須盡快研究及採納的。如果把發展過分集中在金融業上，我覺得這種“曼克頓式”的發展方向必然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正如我們剛才指出，透過調整稅制，補貼基層市民生活，容許市民選擇攜帶福利到更適宜的地方生活，這才能避免基層市民的生活越

來越困難。至於如何創造更多職位，陳鑑林議員剛才在發言時也有提及。

民建聯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訪問了五百多名退休長者，我們發現三分之一的長者對於現時的退休生活滿意(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林大輝議員：代理主席，政府的財政儲備已經超過5,000億元，外匯儲備更超過2萬億元。從數字上顯示，香港社會的財政是非常健康和穩固的。可是，在這些漂亮的數字背後，普羅市民卻不見得活得開心；反之，他們卻承受很大的壓力、非常缺乏安全感，同時亦看不到有何前景，多人更是三餐不繼的。這使得社會上的怨氣越來越深，出現了現時“官富民窮”的現象。為何社會上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歸根結柢，便是因為政府在數方面的政策卻不到位，包括人口政策、工商經濟發展政策、教育政策和福利政策等。政府在這數個範疇均做得不足夠。雖然政府經常說“民心我心”，但若政府依然故步自封，欠缺突破思維來推出針對性的改革策略，我相信貧富懸殊問題是會一直惡化的。

香港是一個奉行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毫無疑問，上層的有錢人是會有很多賺錢機會，但其實我們不應該“眼紅”，甚至出現“仇商仇富”的心態，硬要把他們由有錢人變成窮人。相反，政府應該要創造出一個良好的“補底”環境，來協助低下階層市民改善生活，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生活愉快。

一直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結構也過於單一化，只集中在金融和房地產兩個行業，但香港的700萬名市民，並非每位也希望或適合在房地產、金融或銀行業工作的。由於我們的產業單一化，社會上的工種便越來越少，令到中、下階層市民求職越來越困難，收入也越來越少。

此外，大家也看到，現時一些大集團和大型連鎖店除了做大生意外，連賣菜、賣魚，保安和清潔等小本經營的行業，也是“有殺錯無放過”，滴水不漏地全部包辦經營。因此，即使一些年青人和低下階層市民想創業，想經營一些小本生意，例如開設鋪頭或做小販等，也

失去了發展空間。與以往相比，他們往上爬的機會越來越少。想白手興家又談何容易呢？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了。

其實，政府現時在“積極不干預”和“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思維影響下，對金融和地產以外的行業幾乎是全不關心的，亦從來沒有主動協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持續發展。我昨天批評陳家強局長時亦說過，他明白《稅務條例》第39E條將會對很多無辜企業造成打擊，但他卻依然不理會業界死活、不理會中小企的苦況，不斷推說如果放寬條例便會出現很多實質執行困難及避稅漏洞。可是，他從沒真正關心中小企的苦況，沒有關心中小企經營困難會令很多員工失業的情況。他無意亦無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這些業界代表只能埋怨自己“行衰運”，遇着這類官員了。

企業缺乏資金購買機械，或是沒膽量把資金投資在機械上，其競爭力便一定會降低，生意亦會越來越少，屆時自然便會聘請少些工人。僱員及僱主的收入都一定會減少。那麼，小企業和僱員不貧窮也不能了。

其實，我認為政府與其絞盡腦汁推行扶貧及事後補救的工作，不如直接從源頭着手，減少傾斜的產業發展，更應該制訂長遠有效的工業政策，扭轉經濟失衡和人力錯配的問題，讓社會上出現更多工種，讓更多人更易找到工作，從而增加收入。

以近日經常討論的“競爭法”為例，其實我很希望政府可以把它改為“反壟斷法”，避免一些大集團壟斷市場。否則，在“競爭法”出現後，不但未必可以“打大老虎”，更可能會傷害到中小企，使更多人失業和收入減少。如果一個社會上的中小企發展不蓬勃，我相信這個社會也是沒有生機、沒有朝氣的，更只會積聚更多怨氣。

局長，大家也明白知識可以助人脫貧，但香港的大學學位卻明顯不足夠，每年也有數千名學生無法入讀大學。既然政府無法一下子增加大學學位，那麼可否考慮以資助或免息貸款形式，幫助一些學生入讀外國或內地的大學，讓他們有機會成為將來的社會棟梁呢？這樣，政府也不會白白浪費了人才。當然，讀不上大學並不等於世界末日，並不代表將來沒有成功的一天。可是，政府亦應要加開職訓課程，讓無法入讀大學的青年人可以有一技傍身。所以，我希望政府不時檢討人力市場的需求，支援各大專院校開辦更多實用課程，培訓多元化的人才。

代理主席，我想與你分享一段經歷。最近我在下班後去跑步，從我位於九龍塘的家一直跑到九龍城。在一次跑步途中，我遇到一位老婆婆。這位婆婆已經白髮蒼蒼，我看最少也應有八十多歲了。當時她正推着一輛木頭車，上面則放滿了紙皮。這位婆婆在晚上10時多仍要出來拾紙皮，我相信她的生活一定是很苦困的了。那時，她去到一處斑馬線前，因為是紅燈，大家便停了下來，而她也跟着停下。可是，當我在轉綠燈後跑過馬路時，卻發現那位婆婆沒有過馬路。為甚麼呢？我發現原來她一隻手按着那輛木頭車，並把頭枕在這一隻手上睡着了。大家試想想，她是有多疲累呢？在晚上10時多仍然要推着木頭車出外，更累得在安全島旁爭取十多二十秒的時間來休息。大家從這件事可以看到政府在回歸後的13年間，在“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方面做得好還是不好呢？這現象告訴了大家，是做得不好的。我看到當時的情境，也是感到很不開心。

其實，現時很多“打工仔”的生活壓力也很大。他們既要養自己，養父母，又要養下一代，一旦失業便無錢交租、無錢交學費。所以，“老有所依，老有所養”這個計劃是一定要大力推行的。政府近日修改“生果金”離境限制時，其實他不應太“婆媽”，應該大刀闊斧地“一刀切”，取消離境限制，讓老人家可以回去(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每一個地區在經濟急促發展下，免不了都會先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相信這個現象並非內地獨有，放諸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無不面對同一情況。回望香港經濟，自1980年代起飛後，至今已有30年，情況又如何？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富，富不起來的人則越來越窮。我們的政府最愛爭取第一，很不幸地，本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亦是全亞洲第一。

要紓緩貧富懸殊，歷年來，無論是立法會或民間，甚至是由政府成立的扶貧委員會，其實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措施及方案，無奈政府視這些意見為耳邊風。我現在以餘下的時間，嘗試總結10年來在立法會提出有關紓緩貧富懸殊或協助弱勢社羣的議案，看看政府如何面對。

2000年10月18日，前任議員陳婉嫻要求研究成立更完善的失業保障制度，到了現在的10年後，我們仍要在上個星期的議案中努力爭取。同日，李華明議員要求立法規定殘疾人士聘用配額制度及設立鐘點傭工轉介中心，增加婦女的兼職工作機會，在商界反對下，政府順水推舟，當然甚麼也沒有做。

2001年6月13日，前議員陳國強提出盡快為未能受強積金制度保障的人士，另設法定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對於這個建議，政府又向立法會大耍太極，堅稱強積金制度完善。諷刺的是，我們下星期又將為此進行討論。

2002年1月16日，何俊仁議員建議為純長者住戶減租一半。這個不用多說了，政府連長者的“生果金”也考慮實施資產審查，何況是直接減租？一個沒有敬老心的政府，與他們談長者福利，尤如對牛彈琴。

2002年6月12日，前任議員田北俊提出盡快制訂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政府確實有進行全面的人口政策檢討，但檢討還檢討，是否有任何行動？有否將建議付諸實行？大家心知肚明。

2002年10月30日，梁耀忠議員促請各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半價優惠。相信大家對這項議案都相當清楚，因為這議案由該年開始，每年都有提出，至今只有港鐵願意照做，3間巴士公司完全沒有理會。

2003年10月29日，譚耀宗議員提出調低煤氣費、電費及水費。政府除了於2008年因為要“派糖”平息民憤，提供一次性的電費補貼之外，根本沒有決心解決電力及煤氣等公用事業公司，利用專營權濫收市民費用的問題。

2003年11月12日，鄭家富議員提出改善公共交通收費制度，但到了今天，可加可減機制推出了，可惜票價仍是有增無減。我們最近仍要努力為貧苦基層勞工爭取永久交通津貼。

2004年11月3日，馮檢基議員建議全面研究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並訂立貧窮線。同一個議題，原來馮議員在6年前已經提出了，政府顯然沒有正視問題，更縱容問題惡化，至今天我們仍要為此問題大傷腦筋。

2005年2月23日，又是有關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今次輪到由譚耀宗議員提出，只不過希望有關當局能作出研究，可惜政府仍然充耳不聞。

馮檢基議員果然關注基層，不足1年，在2005年3月2日，他又促請政府制訂量度貧窮的指標，以便對社會上的貧窮問題作出準確分析和評估。但是，至今政府仍不願訂出一個官方的貧窮指標，以解決貧窮問題。

2005年4月6日，陳婉嫻這次是促請政府正視貧窮婦女化，並在各個政策範疇制訂實質政策和措施扶助貧窮婦女。政府連老弱傷殘的福祉都可以視若無睹，對於婦女事務，自然更莫衷一是。

2006年4月26日，李卓人議員這次同樣是提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但措辭更強硬了一點，並非單單要求政府研究，而是希望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讓所有家庭主婦和長者退休後均可即時享有經濟保障。政府再次借助功能界別的力量，否決議案。我們兩個星期後又會再次討論此事。

代理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未能逐一系列述，因為到了2007年仍有這方面的議案。如要全部列舉出來，局長剛才如有仔細聆聽，一定會發現上述多項建議，若非爭取了10年，也都有8年光景，但絕大部分均毫無寸進。

政府究竟要到了何年何月何日，才願意聽取和正視貧富懸殊問題？如果有一天，(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張議員，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國柱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我們很感謝馮檢基議員又提出這項貧富懸殊的議案，但問題是，這項議案差不多每年也有議員提出。大家也記得，政府成立了扶貧委員會，我記得當時馮檢基議員和李鳳英議員也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但無論怎麼扶貧，市民也是貧的。這當然與委員無關，因為很多時候，最後根本是由政府過濾了委員會的所有意見，然後選擇接

納一些、不接納一些，而最終即使接納了，也是採用一些試驗計劃，最清楚的例子便是接納了交通津貼的建議，但也只是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實施了1年，讓合資格的低薪工人領滿了1年交通津貼後又再“斷糧”，不能領取。之後便又返回原本的狀況，沒有交通津貼，又要經過N年，第一年說檢討，第二年說研究。我們現在仍在等待政府就交通津貼提交意見。

我今天不是想討論交通津貼，我只想提出一個例子，說明即使扶貧委員會提出了意見，政府也沒有把那些意見轉化成長遠的承擔，這才糟糕。為何是這樣的呢？我覺得歸根結柢，這是政府本身整個思維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聽到曾蔭權回答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時說，答案很簡單，全世界都有貧富懸殊的問題，難道我們要採用平均主義嗎？難道要像共產主義般，把財產均分嗎？他便是以如此空泛和很一般性的藉口，將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掃到地氈底，當一隻駝鳥，完全不肯面對香港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貧富懸殊的問題，但香港的情況特別嚴重，因為差距越來越大。面對差距大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就這樣把它掃到地氈底，因為差距越大、不公平越嚴重，怨憤便會越大，不和諧的程度亦會越深。我們經常說要香港社會和諧，但如果我們不解決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我不是說要採納平均主義，但如果差距越來越大，我們整個社會最後其實便會自食其果，社會會變得更不和諧、更多矛盾、更多衝突，最後消磨在這些衝突裏，導致經濟或整個社會的發展受到窒礙。因此，我奉勸政府的第一點是，不要將貧富懸殊問題掃到地氈底，不要當駝鳥。

第二，政府另一個不解決貧富懸殊的藉口是香港奉行低稅制。我不知道局長稍後會否重複地說，由於奉行低稅制，所以香港不可以推行太多社會分配的措施；我們如果要有較多福利和扶貧措施，便要增加支出，而增加支出便要增加徵稅。他可能會重複這個論述。不過，這個論述有數個大問題存在：第一，不要忘記，政府現時是“水浸”，“水浸”的地步是整體外匯儲備有二萬多元，當然，二萬多……應該是二萬多億元外匯儲備，不是二萬多。二萬多億元的儲備不是全部可以用作開支的，但當中最底限度有五千多億元財政儲備，再加上過去累積所得，差不多同等數目的盈餘，最低限度共有1萬億元可以動用。如果這樣也告訴我們不可以解決貧富懸殊，聲稱香港是奉行低稅率，香港的盈餘又如何呢？

第二，即使以現時的邏輯說香港奉行低稅率，我們每年也有數百億元盈餘，這代表了我們每年的經常性公共開支就是增加數個百分點亦沒有問題，增加3%沒有問題，增加4%沒有問題，因為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根本有足夠儲備。有些人說現時的賣地收入理想，但隨時都會變差，老實說，最後也是要解決稅率的問題。我們經常說，現時16.5%的利得稅稅率其實很低，職工盟經常說不如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徵收10%利得稅，但對大財團則徵收20%，推行累進利得稅制，這樣，要推出現時需要的多項扶貧措施已是綽綽有餘，只要政府願意打破這種觀念。

為何一直未能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呢？一個致命的地方是政府一直說我們的開支只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0%，如果政府一成不變，以這個“金剛箍”規制開支，根本便無法推出很多措施。所以，政府現時也只是推出一次性的措施，一次性地撥出50億元，然後再呼籲商界捐出50億元，設立“關愛基金”。如果政府願意放棄開支只可佔本地生產總值20%這個觀念，很多扶貧措施或拉近貧富懸殊的措施，其實是可以透過公共開支解決的，但政府卻不願意。

即使政府說由於香港奉行低稅率，所以大家要討論，那麼提出來討論好了。公眾亦需要辯論的。如果我們希望社會有更多較公平的措施，希望教育和醫療的投資可以做得更好，如果經討論後證明需要加稅，我們認為是應該支持的。如果最後確實認為政府的儲備可能不足夠，或如果為了應付這些開支是需要加稅，我們也是可以討論的。可是，政府卻不提出來討論，只是把上述問題掩蓋起來。

所以，代理主席，我很希望政府不要以為單單就今天的議案進行了辯論便可以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沒有誠意。我希望政府拿出一些誠意，不要單以“關愛基金”來敷衍了事(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謝謝代理主席。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本港的貧窮問題一直備受社會各方關注，且貧富差距有日益加劇之勢。社會服務聯會的數據，就指出本港貧窮人

口已達126萬人，創出歷史新高。由1999年至今年上半年，高收入組羣的中位入息由3萬元升至32,950元，而低收入組羣入息則不升反跌，由1萬元下降至9,000元，貧富差距由三倍擴大至三點七倍，情況一點也不理想。

正如自由黨上周提出“檢討安全網保障範疇”的議案，就是要促請政府修補保障網的漏洞，縮窄貧富差距，與本議案的精神，可謂異曲同工。在上周的議案辯論中，更破天荒有10名議員提出修正案，獲通過的建議達25項，反映紓緩貧窮問題可謂民心所向。

雖然局長上周花了近1小時作總結發言，向本會極詳盡地解釋現有政策，但如果每次上來都只懂解釋，聽完議員的意見卻“左耳入，右耳出”，繼續對基層的苦況視若無睹，對獲本會通過的議案充耳不聞，絕非負責任政府的所為。

特別是以政府現時的雄厚財力，實在有條件把扶貧工作做得更好，尤其我們可預見庫房會再次嚴重“水浸”。正如德勤會計師行的估計，政府今年度會有超過700億元盈餘，與原先估計將會出現近300億元赤字，兩者相差1,000億元。如果屬實，則再次反映當局在估計盈餘時再次出現嚴重的“低開高收”，公共財政政策過於保守。

代理主席，對於馮檢基議員今天的原議案，提出重設高層次的委員會，制訂全面的扶貧政策，自由黨原則是贊成的。因為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在2005年成立的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已經解散了，其提出的好些建議，例如成立兒童發展基金及設立交通費支援計劃等，都已獲採納作為扶貧政策，但仍有其他相當多的建議尚未完全採納，而接手其協調任務及監察扶貧工作進度的扶貧專責小組，卻一直跡近“隱形”。這個內部小組究竟研究了甚麼，又向行政當局提出過些甚麼建議，公眾根本無從參與。

舉例來說，政府將推出適用全港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將一改以往以個人身份申請的方式，改以家庭為申請單位，但當中既無諮詢，亦無搜集公眾意見。這種異常封閉的處理手法，亦令公眾擔心此項改動會令計劃變得“明寬實緊”，大大減少受惠人數。

相比之下，不少海外國家的扶貧機制都非常着重公眾參與，如英國、愛爾蘭均在政府部門外，設立平台讓社會人士提出意見，甚至共

同制訂減貧策略。由此可見，本港這種閉門造車的做法，實在大大落後於國際形勢。

雖然政府已成立了“關愛基金”，準備以100億元，大灑銀彈去加強扶貧，但紓解貧富懸殊是一項長線工作，究竟政府是否想借基金作為第二安全網提供長期的支援呢？為何不是由政府經常性開支負擔呢？如果是這樣，對於以個案形式幫助一些漏網之魚，又會有甚麼影響，均有待政府作出詳細交代。

就以本港有211 000個在職貧窮戶，當中很多也沒被綜援安全網涵蓋，他們又是否會由“關愛基金”長期照顧？政府又有些甚麼長遠政策協助他們脫貧呢？

正如自由黨經常提出，紓解貧窮問題，涉及很多不同的政府政策配合，如人力培訓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配合，既要教人學懂捉魚，也要使魚塘裏有足夠的魚供人垂釣，不是光靠派魚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相信這亦是一個高層次委員會可發揮積極作用的地方。

無論政府最終是否設立一個高層次委員會專責扶貧工作，當局均必須加強在教育及培訓方面的資源投入。因為這樣才能協助基層市民掌握釣魚的技能，從根本加強他們的競爭力，增加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

此外，政府亦有必要積極發展地區經濟，以及做好對六大優勢產業和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支援，以確保低收入人士“有魚可釣”，這也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必須加以正視。

至於兩位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如促請政府創造更多基層職位，以及要求本港要充分利用內地發展的優勢，與自由黨目標是一致的，我們均會支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設立一個高層次架構，研究扶貧計劃和執行工作，因為設立高層次架構正好體現了政府對扶貧工作的重視，以及願意作出長期承擔。況且，扶貧涉及就業、教育及房屋等政策，如果單由一個委員會或政策局負責，其實是很難應付及協

調的。所以，我們期望如果真的設立這個高層次架構，千萬不要純粹“吹水”，而是要真的幹實事。我支持馮檢基議員建議由一個高層次架構進行扶貧工作，其實是有一個前提的，便是要真正扶貧，不是單單“派糖”救濟。

我想扶貧的真正意義是促進我們的社會向上流動，助人自助，提供機會鼓勵低下層人士努力向上爬，好像年青人現在最喜歡說的那樣：“如何幫人‘升呢’”？“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想以深水埗區作為例子。深水埗經常被視為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但如果訪問貧窮家庭，那些家長很多都願意很努力，他們最希望的是甚麼呢？當然是不希望子女好像他們一樣。最近，有些年青受訪者竟然表示將來希望成為綜援戶，這的確是大家不想聽到的。我們應該如何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呢？

簡單來說，我們的扶貧政策應該是讓他們脫貧，而不是純粹“派糖”。當然，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好像香港般，救濟是有必要的，因為可以解決即時、急切的需要，但救濟其實只是維持現狀，令他們可以生存下去，並不能讓他們脫貧。所以，我很希望將來如果設立高層次的委員會……我想馮檢基議員是故意採用“高層次”一詞，我自己的看法是，可能會包括整個經濟結構的問題，如果我們純粹增加救濟，只管補貼他們現在的需要，令他們在貧窮線以下能夠生存，我們當然只會越派越多，甚至會有越來越多人需要救濟，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有“升呢”的機會。

我認為這方面必須配合教育。我們現在說不能夠深化教育，但如何能夠拔尖保底？可否實行小班教學，令貧困的孩子只要具有資質，便可以同樣有“升呢”的機會？我認為現時的教育政策是有缺憾的，特別是一些較好的學校都是直資，它們的學費……我們以往讀中學時，只要升中試考得好成績，便可以入讀好學校，但現在很多以往好的學校都已轉為直資，令貧困的孩子無法入讀。那麼，他們如何爭取成為社會最優秀的一羣，或如何可透過努力，有平等上升的機會呢？

我當然明白，如果我們要增加扶貧的資源，政府一定會注視這會否牽動我們的稅制基礎？原則上，我個人極不願意看到要改變稅制的核心結構。我認為香港的低稅制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如果可以無需改變稅制的根本，也能做好扶貧工作，這便是我更願意看到的一個前提。可是，如果真的必須在稅制方面做些工夫，那麼，我相信

這不單會牽涉最富裕的企業，全民也應要參與諮詢，討論究竟要增加到多少，但卻仍然符合稅制的標準。我想這項諮詢不能夠純粹以一條硬數計算出來。

在這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多一些資源，令我們的知識型經濟真的能夠運作起來。我知道政府經常強調知識型經濟，但卻無法將它轉到基層社會。所以，我在這裏必須提到由陳健波議員提出，而我是非常同意的第二項修正案。我多年來一直說政府缺乏長遠的人口規劃，特別是在移民人口方面。我覺得移民人口其實並非完全是低技術、低學歷的，當中亦有一些是比較富裕的。現在把印花稅調高，我認為是一件好事，這未必涉及稅制的結構，但卻可以增加收入。不過，這些收入應作甚麼用途呢？我覺得應該放到扶貧方面。

因此，我認為政府的長遠規劃應該是研究如何令多些人入行，讓他們有工做。例如建造業這個越來越少人願意入行的行業，如何令工人有尊嚴、有地位，如何向他們提供培訓，吸引年青人入行，從而增加就業率，甚至令他們的待遇不是“餐搵餐食”，而是可以變成長工？香港將來有這麼多基建，例如西九文化區，還有其他很多大型項目，正如司長所說，這些將會有機、有序地增加，屆時，工種自然便會提高。如果可以吸引失業的人口或即將失業的年青人在畢業後入行，讓他們覺得兩、三年後便會成為師傅，可以看到自己有“升呢”的機會，那麼，即使辛苦一點，也是靠自己賺錢，他們便不會希望將來靠綜援維生了。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美芬議員：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這兩項修正案其實有其不同的重點，陳健波議員的重點凸顯了一些貧窮人士的來源，例如新來港人士及學歷低、技術低的人士，而第二項修正案，即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則凸顯了財富的來源。如果集中在經濟主導的工作上，例如金融業和地產業，人便有可能會富起來，但如果未能做好結構轉型，便會造成社會分配不均。這兩個題目其實跟我的原議案是沒有分歧的，只是指出了不同的重點，所以，我是同意這兩項修正案的。

不過，我在此想突出一點，其實在這兩項修正案以至原議案中，我們都強調政府的角色要改變，政府不能像以往“大市場，小政府”般，小得動也不動的。我們現在希望它不再是“小政府”，而是要做一個有為的政府，而不是無為的政府。一旦出現問題，便要介入和參與，加強力度。在介入、參與和加強力度之餘，更重要的是要有方向。據我瞭解，曾特首最不喜歡、最討厭有方向，因為有方向便很容易變成意識形態之爭、變成辯論，又要爭拗一番。然而，沒有方向便會變成現在的情況，最終也是要作出抉擇的。由特首領導的管治班子在管理香港的事情上，我看不到何以要把方向交給市場。

雖然很多人已在這裏說過，但我也要再次重申，貧富懸殊的問題於兩組不同的數字上是很清楚的，一組是大家常常說的堅尼系數，從1996年的0.518至2006年的0.533，而2009年也是0.533，這堅尼系數大於0.5已是很危險的。以往官方也會跟我們辯論這個數字，我記得局長跟我們辯論過，指我們沒有計算公屋、教育、福利等，如果把這些也計算在內，結果便會好一些。這果然是好一些，我也給大家讀出一些數字，把這些也計算在內後，1996年的系數是0.466，2001年的是0.470，2006年的是0.475，即是由0.518變為0.466、0.525變為0.47、0.533變為0.475。但是，這個扣除稅項及福利之後的所謂轉移後的堅尼系數的危險線並不是設於0.5，是設於0.4。即是說，無論是有把這些計算在內或沒有計算在內，都是在危險線之上的。所以，我認為當局不能再對這數字狡辯、詭辯，聲稱其提供的福利已妥為處理這問題。

另外一點我認為其實3項議案，即原議案或修正案均指出，藉市場之力協助我們處理香港的問題(特別是貧窮、貧富問題)，是做不到的。市場中最強的行業，是地產業及金融業；市場可能已經死了。這是一個變壞了的市場，為何還是要依靠這個變壞了的市場？

剛才有3位議員，包括潘佩璆議員、林大輝議員及我也說過，市場的運作是靠錢推動的，雖然潘佩璆說——我從來沒說過他是奸商，但大家都是形容同樣的東西，當你在市場中不斷賺取每一分錢，不斷省下每一分錢，令你賺取最多的錢，市場的機制便會變成這樣。然而，因為越要賺得多，做得更好，便要進行合併或併吞，令你有更大的競爭能力，這情況才會導致市場不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壟斷的市場，所以再依靠市場之力是不行的。

最後我想提一提，我在中學時代看過一齣日本電影“天國與地獄”，是黑澤明拍的，講述一些貧民窟的生活。他們望上半山便是一個天堂式的豪宅，在那裏有“落地”玻璃、花園、泳池，也有汽車出入。這羣在貧民窟居住的人都很辛勤的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而，無論怎樣辛勤工作，仍然是要居住在貧民窟中，還要拾荒，並要在垃圾堆中居住。有些人挺不住了，他們把問題歸咎於住在豪宅的人身上，並作出一些傷害富人的事。我相信香港人不會像“天國與地獄”中在地獄居住的人那樣(計時器響起).....希望政府留意有這些情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我一再多謝馮檢基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我亦多謝20位議員剛才提出很多很有用、很實質的意見，給我和當局一個很好的思考機會。

代理主席，我在開場發言時已開宗明義說，政府絕對沒有迴避貧窮和貧富差距的問題。事實上，我們一向都正視這個問題，很積極、很務實、很認真地處理這個問題，很用心去扶貧紓困。有議員說，他們在每次議案辯論中提出的意見，我們都是照聽，但政策照舊。我覺得這些批評有欠公允，為甚麼呢？大家如果有留意過去數年，當局在幫助基層市民方面，其實做了不少工夫，亦有不少工作。讓我舉數個簡單的例子：第一，最低工資的落實來得不易，標誌着政府在這方面的誠意和承擔，以及幫助基層市民的心；第二，當局吸納了大家的意見，把跨區交通津貼計劃擴充至18區。這些工作如果不是政府對市民訴求的回應，又是甚麼呢？所以，請大家評論時要公道一點，要講求事實。

剛才有多位議員提及住戶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以致貧窮問題日益嚴重，這個問題我們完全理解。然而，大家要明白收入差距與貧窮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論上，即使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加，生活有實

際改善，社會整體的收入差距亦未必收窄，為甚麼我這樣說呢？由於較富裕的一羣也可以同步受惠於經濟增長，所以距離仍然會存在。儘管如此，正如大家清楚知道，政府多年來一直透過稅務政策，以及在教育、醫療及房屋等範疇提供大幅資助的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利益轉移，收窄收入差距。

馮檢基議員剛才在發言時提到，政府在堅尼系數方面狡辯、詭辯，我們絕對沒有。或者容許我簡單分析一些客觀的數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若以堅尼系數去分析收入差距，在2006年香港未經調整的堅尼系數無疑為0.533，但如果把稅務及各種社會資助，例如房屋、醫療及教育等方面的影響計算在內，並撇除住戶人數減少的影響——這點一定要計算——在2006年經調整的堅尼系數實際上是0.427，與1996年(即10年前)的數字相同，與2001年的數字比較，則只輕微上升0.006。這顯示在這10年間，香港社會的收入差距其實變化不大，亦可見政府的措施對財富分配產生一定的作用。我講這番說話，並不代表我們覺得問題不嚴重，我們會繼續做工夫，希望盡量扶貧紓困。

有議員建議訂立貧窮線和減貧指標，其實這些建議在以往的討論中提出了很多次，我再次作出精簡的回應。如果大家記得，前扶貧委員會認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富裕的城市，要較全面客觀地審視貧窮問題，不能夠單單採用所謂“絕對貧窮”或“維持基本生活的能力”的概念，也不能夠只看住戶收入。我們必須同時考慮貧困人士及其家庭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包括他們在住屋、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能否得到生活上必需的服務和機會。

政府認同前扶貧委員會的看法——馮議員當時也在席——因此政府一直採用委員會提出的一套24個多元化指標，從不同角度審視香港的貧窮問題，瞭解社會上不同組別人士，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在職人士和長者，以及地區居民的需要。除了政府的政策及措施外，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貧窮的情況，因此很難訂定具體的扶貧目標。這套多元化指標可以協助我們制訂各項幫助有需要人士的政策，以及評估這些政策的成效。

按照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準則，香港的貧窮情況在2008年金融海嘯前事實上是持續改善的，貧窮人口由2003年的103萬，逐漸下降至2008年的71萬。受金融海嘯影響，香港的經濟在2008年第四季開始衰

退，受到很大沖擊。2009年的貧窮人口的確上升至84萬，但隨着經濟踏入2010年後穩步復蘇，勞工市場續見明顯改善，失業率已由去年高峰期的5.5%回落至最近的4.2%，總就業人數連續5個月上升，新增職位在過去5個月累積達到48 000個。在今年6月，按年計的名義工資亦錄得2.2%的增長。申領綜援的個案數字亦持續下降，領取綜援的個案由去年年底的289 000宗，回落至今年10月份的285 000宗，其中申領失業綜援的個案由33 000宗回落至30 600宗，有下調的趨勢。

代理主席，無論有多少貧窮人口，政府都有責任照顧弱勢社羣，保障基層市民的生活。政府一直採取務實和全方位的策略處理這個問題。正如大家清楚知道，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縮窄貧富差距的根本之道，是發展經濟，讓市民分享繁榮成果。此外，政府亦會繼續投資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提供就業支援、提升勞動人口質素及保障工人合理工資水平。當然，最低工資是一個突破點。政府亦會為有需要的人士和弱勢社羣提供穩固而可持續的安全網，即社會保障制度。

王國興議員請政府採取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這點我完全認同，我亦多謝他向我提供這本最新的報告。我也有看以往的報告，我最近剛剛為你們最新的報告撰寫序言。事實上，發展經濟有助創造職位，從而改善市民的收入，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所以，政府一直以來都致力透過基建項目和鼓勵投資，推動經濟發展。過去數年，我們積極落實十大基建、啟德郵輪碼頭、迪士尼擴建等工程，又推動本土經濟和發展社企，為不同階層，特別是基層市民創造了不少職位。

此外，行政長官早在2007-2008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強與內地的聯繫，以配合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為確保香港在“十二五規劃”期間能進一步發揮優勢，我們會致力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及物流中心的地位，強化四大支柱行業。正如大家所熟悉，四大支柱行業是指金融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和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業。我們要把握內地的發展機遇，發展6項優勢產業，即檢測認證、醫療服務、科技創新、文化創意、環保產業和教育服務，為香港服務業積極開拓新市場，長遠為香港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提升市民的收入，促進向上流動。

政府一直相信，大力投資教育和人力培訓，提升勞動人口的質素和競爭力，是應對跨代貧窮、促進社會流動的治本之法。

正如大家清楚知道，教育開支現時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約24%，是各項政策範疇中最高的。因此，教育可以說是最大的投資項目。政府近年推出了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實施了12年免費教育、資助學童上網學習，又支援清貧學生課後學習。由2010-2011學年開始，我們亦會把“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每年的撥款由現時1億元大幅增至1.75億元，讓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分別為清貧學生籌辦更多更高質量的校本及區本課外活動。政府亦會在2011-2012學年，把“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定額津貼大幅增至1,000元，而適用於綜援家庭全日制中、小學生，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也會相應上調。此外，政府成立了3億元的兒童發展基金，支援弱勢社羣兒童的長遠個人發展，減少跨代貧窮。

陳鑑林議員剛才發言指出，人力培訓、提升人力質素是很重要的，我完全認同陳議員的看法。我們亦透過職業訓練局和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提供培訓及再培訓課程，幫助學員獲取所需的職業技能及認可資歷，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及競爭力。有關服務會顧及不同年齡人士的培訓需要，例如“青年培育計劃”是為青少年而設，“新技能提升計劃”的對象是中年人士。勞工處亦已於2009-2010年度加強一系列的特別就業計劃，為不同背景的就業困難人士提供協助，包括整合為青年人提供支援的“展翅·青見計劃”及“中年就業計劃”等。我們會繼續透過加強培訓和再培訓，提升勞動人口的能力和競爭力。

在保障基層工人及就業支援方面，我們預期在明年勞動節（即五一），便會全面落實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基層勞工，寫下香港勞工史重要的新一頁。為配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除了繼續加強青少年、中年人及殘疾人士的就業服務外，勞工處會在今年年底（即下月），推出為期兩年的“就業導航試驗計劃”，並在明年年中於天水圍試行一站式就業及培訓中心，以理順、整合和提升現時由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和再培訓局提供的就業及培訓／再培訓服務，為求職者提供更切合需要的支援。

代理主席，在設立安全網方面，正如我在開始時提及，現時香港已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政府亦一直在教育、衛生及房屋數個重要範疇提供許多免費或大幅資助的服務。一個實際例子是，在2010-2011年度（即今年），政府在社會福利（包括綜援、高齡和傷殘津貼）、教育、衛生、房屋等4個主要政策範疇的經常性開支是1,392億元，佔整個特區政府公共開支的57.2%，這點很清楚看到我們的承擔。

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建議政府設立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處理貧窮問題，這建議與議員早前倡議重設扶貧委員會的意見相似。我想指出，前扶貧委員會於2007年完成當時的任務後，政府隨即成立了跨部門扶貧專責小組。我強調是跨部門，不單只是勞福局。該小組由我出任主席，負責統籌及推動工作，所有政策局和部門都參與，有二十多位高層的同事。我們負責全面跟進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53項建議，以及協調政府內部如何推動和落實扶貧工作。黃成智議員以為我一個人負責，但我強調，我不是單打獨鬥，我不是大力士，不是超人，其實是大家羣策羣力，整體政府的努力，上上下下一起做。該小組全面落實前扶貧委員會的53項建議，正如大家清楚知道，這些建議大部分已經落實或正在進行。讓我複述幾個例子：設立兒童發展基金；偏遠地區交通費支援計劃升格至涵蓋18區的全港性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加強青少年、中年及失業人士的培訓及再培訓；設立天水圍的一站式就業培訓中心——就是來自委員會的——推動民、商、官三方合作，發展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羣創造就業機會。我們認為這個安排是恰當的。扶貧專責小組會密切監察香港的貧窮情況，並繼續努力協調政府各部門的扶貧工作，以及探討可協助弱勢社羣和有需要人士的新措施。

剛才我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清楚交代，特區政府分3個範疇處理貧富差距的問題，就是特別投資教育、支援就業和提供社會福利。大家如有分析今年的施政報告，便知道我們的重點是投資這幾個項目，反映整個政府上下一心，以實際行動顯示我們的決心和承擔，這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另設一個委員會。

陳健波議員一針見血地帶出了人口政策與貧窮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很多謝你的真知灼見。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新移民為社會帶來人口增長，這點我們歡迎，因為香港要增加人口，但他們在帶來人口增長的同時，亦增加了低技術勞動人口的數目。面對這個現實和挑戰，我們一定要鏗而不舍繼續為有需要的新移民提供培訓及再培訓，加強他們的就業能力，提升他們的就業機會和競爭力。新來港人士只要符合有關課程要求，便可報讀再培訓局所有有關課程，我們歡迎他們報讀這些課程。此外，再培訓局亦設有特別課程，協助他們適應及投入本地勞動市場，其中一個例子是全日制的“就業基礎技能證書”課程，為新來港人士提供了全面的基礎技能培訓，再培訓局在提供該課程時更與社會福利署（“社署”）合作，利用社署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小朋友提供幼兒照顧服務，讓學員在上課期間安心全程投入接受培訓。

代理主席，剛才有很多議員提到“關愛基金”。“關愛基金”的成立標誌着政府動員社會人士和工商界攜手一起扶貧紓困。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成立這個基金其實有兩個希望：第一個希望是能夠補足現時社會服務和援助覆蓋不到的地方；第二個希望是通過個案的積聚和實證的經驗，幫助政府不斷完善有關的服務和保障制度。我們有信心基金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更到位，更彈性的支援，對扶貧紓困會起積極和正面的作用。

代理主席，扶貧紓困是政府的重點工作。我們會繼續務實處理貧窮問題，通過多管齊下的政策和支援服務，鍥而不舍，協助有需要的基層人士。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現在請陳健波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陳健波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長久以來，政府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嚴重傾斜”，並以“鑒於政府長期側重個別行業，缺乏全面及均衡的發展策略”代替；及在“和深入研究，”之後加上“特別是人口政策令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工作崗位需求大增，以及如何創造大量基層職位等事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健波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馮檢基議員議案。

代理主席，我剛才在發言時已說得很清楚，現在沒有補充。我認為，原議案及我們兩項的修正案均是從不同角度論述如何縮減貧富差距的問題，是殊途同歸的。

王國興議員就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有效”之後加上“並公平公正地”；在“扶貧措施”之後加上“及滅貧目標”；及在“讓社會各階層”之後加上“，尤其是弱勢社羣，”。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馮檢基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5分零6秒。在馮檢基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局長所說的話便正如我剛才所說一樣，是重複了的。我們的特區在1999年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時，曾作過一輪的派錢扶貧措施。2003年發生SARS時，我們又派錢扶貧。2008年金融海嘯，我們再派錢扶貧。單為這3件事派錢，已經超過1,000億元，再加上局長剛才在20分鐘內不斷的數，加上他在上星期也在不斷數的所有行為，得出來的結果是怎樣的呢？縱使他也承認，我們有房屋、教育，甚至住戶人數減少等因素——我們對此是有一個名稱的，稱之為“計算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他也說數字是0.457，而超過0.4的便是在危機之上，即他的數字也說明現時是危險的。局長，為何做了這麼多事情、做了10年，我們仍然在危機之上呢？他有否想過這情況為何會繼續出現呢？他不是沒有辦事，但為何不斷做也是行不通呢？這便是思維的不行不通，而方向也是錯誤的，全部也交給市場來處理。

其次，我想說的是，我們有些同事說知識可以改變貧窮。理論上、原則上，這是正確的。然而，有些數字告訴我，這個問題有可能改變，我希望局長能留意一下。社聯提供給我們的數字顯示，我們在工資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貧窮人口有126萬，佔全港人口的18.1%。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大多數均沒有受過教育，65歲以上的貧窮人數佔33.9%，15歲至24歲而受過香港9年免費教育的——當中也有大專生——貧窮率是20.1%，高於香港的平均18.1%。換句話說，受過教育、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也不是優勝很多。所以，說教育能改變貧窮，這未必是正確的。

我剛才用“天國與地獄”那齣戲為例，我並非說香港人像那齣戲中的人，有着仇富的情緒，但這傾向並非沒有可能的。林大輝議員剛才說，大發展商連清潔公司及保安員的工作也收歸為自己旗下，全部職位都歸入自己旗下，中小企已無法生存，更不要說我們這些低收入人士了。然而，我希望潘佩璆能“勞氣”一點更好，他太接納商界了。

要處理貧富差距這問題，一定要建立新的經濟支柱，而不是交給市場來處理。我完全同意及支持政府推行六大支柱產業。政府除了撥出數幅土地，之後便只在等待，一年多了，快要2年了，有甚麼結果、甚麼結論？有甚麼成績呢？為何政府不提交這些報告給我們呢？我們要看這些報告。

我重申，解決貧富差距不單是要派錢，也不單是要扶貧，而是如何令新的經濟出台。這些新的經濟能夠幫助我們，讓我們的市民有機會、有基礎流轉。這必定要由政府帶動、推動才可以做到的，而這個六大經濟支柱也必定由跨部門、跨政策局來負責，並要輔以政策推動的。

我曾前往台北，當時馬英九擔任市長，正在推行收集食物廢料的措施，這也是要由當地市政府推動才能做到的，包括便宜的地價、租金、資助進行垃圾收集的商人，以推動最低限度最初6年的工作。要求他們做蝕本生意，是沒有商人願意幫忙的，這便是自由市場以金錢為目標的情況。

再者，如何令人們認為自己有能力，有願景，期望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的呢？社企是一種方法。在西班牙，合作社是另一種方法。不過，當然西班牙的合作社跟香港的合作社是不同的。應該讓人們覺得肯努力、創新，便能有所提升。香港並不是這樣的，商界一出來便已經把人們“打沉”了，沒發展的機會，這是要政府的政策……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曾做過甚麼？成立了超過1年了，從未提出1個建議，還仍只有那1.5億元的“伙伴倡自強”計劃。人們拿到了這筆錢後便自生自滅，便是你們自己的事，便好像生了孩子卻不養、不理會，因為政府擔心一旦幫忙了，商界便會責怪。這些弱勢社羣其實正正是要在政府的扶助下，才能站起來，而這種做法也能令一些有智慧的人，透過這種方法、平台來建立自己的企業和事業。局長，請正面、積極地考慮貧窮的問題(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答辯時限到了。

馮檢基議員：……並非只是“派錢”，而是“派政策”。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健波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代理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5時38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wo minutes to Six o'clock.